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3月31日第4期

总第127

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27期

目 录

【要有光】

胡 杰 答客问——关于版画《种子》

胡 杰 这些画就要离开我们了

【专稿】

吴 迪 文革口述中的心理学

——在“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发言

【评论】

辛 逸 仰望茫茫夜空，我们能知道什么？——历史客观性漫议

【札记】

马昌海 阅读与思考——有关“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三）——萧军在延安时对党人的观察与期待

【访谈】

戴为伟采写 郑仲兵口述——文革之我见

戴为伟采写 冷卫口述（三）：读书会

【随笔】

启 之 滑溜溜的委婉——“红色话语”小议之二

【述往】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九）——小营子的“反革命”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八）——北师大的同学

【资料】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给毛的致敬电（1949年10月3日）

中苏友协总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49年10月5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给毛泽东同志的致敬电（1953年10月6日）

【读者来信】

1. 小庄谈“狼奶” 2. 国庆谈“狼奶” 3. 张晓良纠错

【版权声明】

【要有光】

答客问——关于版画《种子》

胡杰口述 戴为伟采访整理



客：你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为什么给它起名为《种子》？它有什么寓意吗？

胡：“种子”是宗教的符号，它是万物的起源，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根本。

客：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万物起源论”。基督教认为是上帝造了万物，伊斯兰教认为万物来自于真主，佛教认为万物是因缘而生，道教认为万物之母是道。“种子”这个形象是不是象征着这些宗教共有的东西？

胡：可以这么说吧。

客：据我的理解，画面上的那只巨手，代表着你说的上天，手心中的那些小颗粒，是你说的万物之源，它们以植物的种子的形象出现。上天将这些种子交向人类——那个略略弯腰屈腿的小人。这个人是在播种吗？

胡杰：他可能在播种，也可能很无奈地看着土地。就是创作时的想法，我想把这个想法固定下来。当时想法很复杂。它就不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表现大饥荒的版画那样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它是一种象征，一种哲理的思考，一种不可名状的创作冲动。因此它更具有绘画性。或者说，正因为表现思想，绘画才有了更高的存在的意义。

客：画面左侧的土地里伸出一个人头，他的耳朵很大很长，他是佛陀吗？他和那只巨手、那些种子是什么关系？与那个人又是什么关系？你想通过他表现什么？

胡：他是给予人类种子的神祇。他注视着这片土地，注视着他眷顾的人类。他是在启示人类，还是要指引他，召唤他，或者仅仅是无奈的注视，深沉的思考。很复杂，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还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客：说不清楚是因为你处在创作状态。用尼采的话说，创作中的艺术家是迷狂的、疯颠的，非理性的，就像喝醉了一样，所谓“酒神精神”。

胡：有时候，当我形成一种观念的时候，我的内心会猛然震动一下。但是我不一定能够说出来震动我的到底是什么。但是，这种说不清楚的思想，绘画却能把它表达出来。这就变得有点复杂。其实，艺术家不太想描述自己的作品。因为他遇到了这个困境：使他心灵震动的，他不能够用语言说出来。对这幅画我也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我所能做到的，就是用刻刀努力地表达，我为什么要这样去画一张画。为什么一只手在黑夜当中，这只手和种子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精神的种子，还是物质的种子？我都说不清楚。我只觉得种子对我们很重要。它不是从手上洒下来，而是手上有一个窟窿，从那里掉到土地上的。这会不会有一种更冲击我们内心的东西出现？

客：这可能就是“诗不自解”的原因。语言在艺术面前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胡：你看我的刀法，狂放奔驰。刻的时候，让木版故意劈了，刀法很乱。上天给人类的种子是普世的，对任何民族都一样。我们世代代播种、耕耘，但是我们收获了什么？我们为什么就走不出这个困境呢？■

【要有光】

这些画就要离开我们了

胡杰

这些画就要走了，要去办一个展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办个展，而且是在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我事先去看了场地，很棒。

就像亲人长期和你生活在一起，猛然有一天他告诉你，他要远行，也不知会不会再回来。我和芬芬都很难受，但我强调：它们都是自由的，既然它们有了灵魂，它们就应该有自己的生命旅程。这种离开还不像我的纪录片，完成的纪录片就像麦种，你送给别人你还有，撒在地上它就可以生长。而画是唯一的，它走就走了。

在历经人生之后，在惯看中外艺术之后，那种绘画的冲动依然没有消退，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依然有一股激情在裹挟着我。

我的画有两种，一种是水墨，这是我小时候外公种下的种子，他是一个民国时期在山东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懦弱文人。中学我又师从一位被迫还俗的僧人朱墨林先生。另一种是油画，那是我当兵的时候在军艺上了两年没有文凭的油画进修班的种子。

那时，我每每梦想着东、西方的艺术形式在我这里可以交流和交融。而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我的性格不适宜探索抽象的艺术形式。被从圆明园赶出后，给了我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那时候我拿起了摄像机，对准了脚下这块浸满浓烈味道的土地。虽然在拍纪录片，但绘画也进入了更独立和有质感的思考。所以，我在画中对书法有这么一段题字：书法本身有法度、审美和表达的含义，但它更深刻的一层是：通过书写每一个字词而透彻感知生命、政治和历史之重量。否则书法只是空壳。

我觉得这个题字也适合我的绘画，就是生命、政治和历史疼痛的思考和表达。技术层面的审美和前人的丰富探索与表达，这是我绘画知识的前提。而我要做的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自身经验的表达。绘画技术有天才的感受和迟钝的理解两种区别，这是天意，我不去多想。我只是遵守天意，如同到达一个目标，你是行

走、骑马、开车还是飞机。我仅仅发掘我的表达，一块历史的淤血郁积在心中，那种历史的痛和人的遗忘是否要经过一下过滤再归于尘土？而我微小的生命也想通过绘画的表达找到一个存在。这种表达属于那种行走或骑自行车的，很慢，用自己的体力，是原始的方法，和我拍纪录片很像，努力表达得更本质一些。本质的意思就是生命的精神。

每次我把画送人，芬芬都很难受，但她不说为什么难受。我总安慰她：这些画在别人家里会受到很好的照顾，而我们的画已经放满了房间，我要腾出挂画的地方。

现在画们要走了，这些和我们相伴的精神伙伴。只在电脑里留下它们的影子，就像那些墙上黑白斑驳的老照片。

搬家，这些画是使我最心痛、心狠、心木的。那些激情和思考、多年相伴，多一笔嫌多，少一笔嫌少，废寝忘食的作品，成叠成卷成堆地在尘土中，在垃圾中磕磕碰碰上车下车。有些画遗失了，有些画发霉了，有些画在废弃的小厨房与杂物共处。我漂移到另一个世界，在并不久远的历史里痛哭。回来偶尔翻翻这些画，看到当时那么多激情撞击，那些邹巴巴的画稿，就因为一个笔触、一个局部一个构图打动了我，我就爱爱惜惜地把它收藏起来，可这样一放十年，满头灰尘。有时候心一横成卷烧掉，在火中告别，在遗失中告别。

说来说去，画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是我的也是芬芬的也是我们家的成员。它有灵魂，是我们的精神伴侣。■

2014年8月12日

【专稿】

文革口述中的心理学

吴迪

为了办《记忆》，我从2008年开始拿起录音笔采访文革亲历者。几年下来，我见到了各种心态的受访人，美国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领教了美国受访人的“表面抗拒”、“欺瞒不说”、“操控”、“报导不实”。而中国的受访人则让我对“中国特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文化大革命为其亲历者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在谈论毛时代的时候，会受到恐惧心、抗拒心、羞愧心、疑防心、迎合心等多种心理的影响。

一、恐惧心

三年前，有一位老人不断地给我写信，说我们办的《记忆》功德无量，并附来了他的稿件。他是1932年生人，搞“苏东”研究的，出过几本书。他的稿子说的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事，可是非常简括，除了时间、地点、人物之外，几乎没有细节。说是大事记吧，又不完整连贯。感到是文革的重点，我与他通话，电话那边的声音很大，急切而热情。看来，此人有好多话要说。

我要到他府上拜访，他婉谢，说宁愿出来见我。约定在北师大附近的茶馆见面。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白发稀疏、戴着墨镜的老者。他一边跟我握手，一边巡视四周，最后选定一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我请他写写社科院的文革。他说，退休以来，他有三不：不开会、不讲课、不动笔。我问他，可否录音，由我来整理成文稿。再交他把关。他说：“让我想想吧。”

这一想，就是三年。

经验告诉我，他害怕了。巴金在《随感录》中说：“这些年来我有不少朋友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种种奇怪的恐怖病（各种不同的后遗症），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毒草病’的患者。这个病的病状是因为害怕写出毒

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页36）。这位老者显然是上述后遗症的患者。

好莱坞电影人擅于“最后一分钟抢救”，旧时期的过来人擅长“最后一分钟逃脱。”逃脱的借口有N种，“让我想想”属于最直白的。曾有一位陈姓老者坦言相告：“现在，在公共场所骂骂街、发发牢骚我敢，但是，你要录音，我不敢——我不知道你会把它用到什么地方？你要是弄到海外，我就领不上退休金了。”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说，反右的缺点是人们不敢讲话了。他不知道，在他钟爱的文革结束三十多年后，人们还生活在恐惧之中。

二、抗拒心

江青在文艺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搞了八个样板戏；而这八个中，最杰出的则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此剧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扮演洪长青的刘庆棠，他当年被称为中国的“芭蕾王子”。在江青的时代，他身兼二职：既是舞蹈大师又是文化部副部长。

我查阅了有关刘庆棠的所有资料，撰写了采访提纲。为了避免他的难堪，我在提纲中回避了所有敏感的话题；在二十几个问题中，只有四五个与江青和文革的文化体制有关。

我用快件把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的介绍信、采访提纲、协议书等盖着大红印章的材料寄出三天后，给他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告诉我，刘先生病了。让我过几天再打。又过了几天再打，电话那边叽叽咕咕一阵后，告诉我：“刘先生出去了。”

我担心是那个访谈提纲吓着了刘，重拟提纲，写信解释，只求人家俯允，与我谈谈，谈什么都行。但是，刘先生还是避而不见，直到他病逝。

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刘庆棠不见我——我自以为能赢得他信任的大红官章，使他产生了抗拒心——只要是政府派来的人，我坚决不见，一句话不说。怀有这种心理的不是刘庆棠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他们是当年的造反派，文革后成了“三种人”。这些人当年是轻者双开，重者判刑。失败感、屈辱感、上当受骗

感，使他们有一肚皮委屈和愤懑。他们知道什么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以抗拒包括回忆的一切。

三、羞愧心

羞愧之心也足以让人们远离口述之门。一位大公司的副总是这样拒绝我的：“请原谅，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因为让我回忆往事，就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我不能再想过去的事了，一想血压就上来，就得吃安眠药。跟你讲一个小时，我一个礼拜都缓不过来。我觉得上帝已经给了我足够的惩罚。五年前，我皈依了主，我资助残疾人，做各种善事，以弥补我的罪恶于万一……”

他的罪恶是什么呢？我在别人那里找到了答案——文革初期，他写大字报揭发他的恩师，还在批斗会上揪过老师的头发，打过他的耳光。而正是这位被他打骂的老师，却在“三种人”的审查之中，为他说了好话，使他免于牢狱之灾。后来他出了国，拿了学位回国，当他去带着重礼去看老师的时候，已经是人迹楼空。

过去的折腾留给人们太多的痛苦。可以说，旧时期的亲历者都程度不同地患有心理创伤。这创伤会唤起正常人的羞耻心和愧疚感，道德感强烈的人，会向宗教寻求救援。知耻近乎勇，羞耻心和愧疚感固然可以净化心灵，提升道德。但也足以让人们逃避记忆。

四、疑防心

在上海，我遇到一位古怪的受访者，他坚决拒绝本地的摄像师。尽管我向他说，我的摄像师由上海师大的研究生兼任，这些研究生不是本地人，更不是电影圈内的人士，况且他们都是与国家电影资料馆签了保密协议的。但是，这位受访者仍旧坚持只有北京来的摄像师才能旁听他的口述，才能给他录像。

我把这种心态称为“疑防心态”——疑虑和防范之心。事实上，大多数怀抱此种心态的人并不清楚他自己疑虑和防备什么。换言之，“疑防之心”只是一种感觉。我曾经这样问过上述受访人：“您怀疑什么？怀疑我的身份还是我的动机？您顾虑什么？是怕我不遵守合同吗？您防备什么？是担心我们整你的黑材料吗？”他有些尴尬——他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怀疑什么，顾虑什么，防备什

么。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来自于他们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形成源于安全感的长期缺乏。

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成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安全需要”是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个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心理上表现为“希望解除严酷的监督的威胁，希望免受不公正的待遇，希望远离犯罪的侵害等。”也就是说，受访者的“恐惧、害怕、焦虑、紧张、担心、不安等都是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后果。”

在所有的怀揣“疑防之心”的受访者中，刘先生是个例外。他对自己的疑虑和防范有清醒的认知。“我怕你们整我黑材料”；“我担心我说了实话又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不是对你们电影资料馆不信任，说老实话，我对这个社会都不信任”；“我觉得我最好留一手，不能把真话全说了”……这是他在受访后说的话。这类表达，说明他的“疑防之心”在弱化，他对我们的信任感在增加。他携妻将子同来口述现场，并同意我们采访其妻其子，也说明了这一点。而要做到这一增一减，主访者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熟悉那段变化莫测的历史，尤其要对上海电影厂的文革和其中的人事关系心知肚明。第二，要了解文革中的造反派。知道造反的人大概分几种，不同的造反者参加造反的原因和目的。以便你能准确地判断受访者属于哪一类造反派。第三，不管他属于哪一类，都要对他表示出最大的理解和尊重。

五、迎合心

与“疑防心”相对的是“迎合心”。迎合心指的是受访者根据其主访者心思的揣摩，选择那些他们认为符合其口味的内容来讲述，或者在回答问题时有意无意地附和主访者的观点。这类受访者与拒绝者和“疑防”者不同，他们不那么封闭，不那么偏执，政治运动后遗症较少，而且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掌握较多信息，与媒体接触频繁，了解市民的关注点和当代文化的多元性。因此，他们在访谈过程中能够很快地摸清主访者的思想倾向和兴趣。然后挑些你爱听的，感兴趣的话题来说。至少，他们不会反驳你，对你的看法采取附合的态度。

迎合之心，人皆有之，只是迎合的程度和对象不同而已。从心理学上讲，迎合有融洽人际的积极意义。怀抱此种心态的受访者往往是出于善意。这里面既有长辈让晚辈高兴，又有老者向后生炫耀其见多识广的双重心理。

沈先生就是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写过几本关于老电影人的书，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在他看来，我们一定会对电影明星感兴趣。因此，他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讲述他们的秘辛逸闻：周璇的金条藏在了什么地方，周璇与哪位影人有了私生子，石挥与周璇的恋爱风波，石挥为什么自杀等等。在采访中，他喜欢重复的一句话是：“我在电影厂这么多年，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言外之意，不管你需要什么货色，我都可以保证供应。

对于这种善意的迎合，主访者要更加严格地控制自己说话的欲望，学会不过分表现自己的倾向性，避免流露自己的思想感情。要设法在受访者滔滔不绝的讲述中提醒他：我们关注的不是明星，想听的不是男女关系。

六、性关系与“羡慕情结”

在访谈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受访者，无论男女，无论搞艺术还是搞行政的，对同事的婚外性关系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些老年受访人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别人的婚外性关系上？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种心态又表明了什么呢？

首先，受访者谈论的婚外性关系者都是“成功人士”。对于成功人士，社会一向有着较严格的道德要求。接受社会与公众的道德监督，是成功者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如果成功者有婚外性行为而社会的监督缺席的话，受访者就要担当起为社会监督的任务，将成功者的丑事四处传播。

其实，受访者将成功者不光彩的一面倾诉出来。这其间的心态既有对长期缺席的社会监督的不满，又有对成功人士道德缺陷的愤怒。其中还夹杂着披露“真相”的快感，以及在受访者潜意识中涌动着的，对成功者和他们享有的这类性关系的“羡慕情结”（Resentment complex）。

“羡慕情结”是尼采发现的，是一种普适性的“在人类道德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影响着个人的行为方式”的重要心理因素。无论哪国人，无论哪个时代，无论何种制度下，我们都会听到关于命运的抱怨。同样，因为回味过去的精

神伤害而愤愤不平的事，也史不绝书，随处可见。“一方对另一方的一种不肯承认的嫉妒与幽愤”，也并非中国独有。问题是，命运之不公，精神之伤害，该得到的没得到等等，在我们的受访者身上表现得格外频繁而沉重。

七、议论国是与“焦虑感”

除了婚外性关系之外，受访者最关心的还有当代政治，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政经结构和意识形态。当受访人讲到亲身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加入自己的评价。陈女士在讲述自己如何糊里糊涂成了右派之后，给我们展示了她当年的日记。康先生在讲述自己作为牛鬼蛇神如何被批斗之后，给我们展示他保留的纪念品。刘先生则在给我们翻看他的照片之后，大讲特讲对“苏东波”的理解，而这种离经叛道的议论常常占去了很多采访时间。

不管他们的看法是左，是中，是右，是主流、支流还是异端，受访者的讲述都会从文革转向当下的腐败，高昂的房价，转向僵化的政经结构，转向对几代领导人的评价……。

研究文学的人们发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在这些老人的牢骚中，隐约可见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特有的危机感和焦灼感。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认为近年来中国频繁出现的群体事件是“社会泄愤”。这些受访者对当下现实的执迷，不妨称之为“历史泄愤”。

八、“双重文本”

这种现象昭示我们，在口述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双重文本”——包括我们在内，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隐秘，都有自己的顾虑和担心。因此，当这些人成为受访者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潜文本”。也就是说，每个受访者都有两个口述文本，一个是他同意公开的文本，一个是他拒绝公开的文本。显而易见，“潜文本”与“显文本”相加之和是受访者口述的全部内容。所以“潜文本”增多，“显文本”就会减少。反之亦然。

所有的口述历史的工作者都希望增加“显文本”，减少“潜文本”。这个良好的愿望取决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主观指的是受访者的心理、性格，客观指的是受访者所处的社会条件。

从发生学上讲，客观大于主观。社会条件对“潜文本”产生的普遍性以及它在口述总和中所占的比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言之，如果受访者经历了较多的令人困惑的事件，受访者所生活的社会存在着较多的不安全感，那么，“潜文本”的比重就比较高。“潜文本”的深度和广度，与社会的和谐、公正程度成反比。社会的和谐、公正程度越高，受访者的顾虑和担心就越少。上面提到的恐惧心、抗拒心、羞愧心、疑防心、迎合心同样也会减少。

在采访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受访者在叙述中突然停顿下来，嘱咐我们：“这些话你们可得删掉”，或者是“这些内容可别外传”。更糟糕的是，当口述变成文字准备发表的时候，受访者突然变了卦。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删节，不但要将所有的人名隐去，而且要把所有生动深刻的对话，有血有肉的细节删成几根枯骨，直至像那位台湾同行说的那样，将你的辛苦劳作变得“惨不忍睹”。

值得安慰的是，显、潜这两个文本在受访者那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时间的流逝，人事的变迁，思想情感的异动，以及时政观念的更新改变，都会使受访者对原来的口述产生新的认识，从而使某些“潜文本”浮出水面，跻身“显文本”之列。换言之，这里的“显”与“潜”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一般来说，其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由“潜”而“显”，而不是相反。台湾的口述史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之后，对其要求删除的“潜文本”采取“保留一段时间再做决定”的办法，顺应了这种趋势，值得我们借鉴。■

【评论】

仰望茫茫夜空，我们能知道什么？

——历史客观性漫议

辛逸

拙文《“新瓶装旧酒”——评〈乡村中国记事〉》在《记忆》第123期刊发后，看到几位读者的评论。我阅后很受教益和启发，感到意犹未尽，愿再啰嗦几句。以下文字不是学术论文，想哪说那，不成系统，仅供读者、方家批评、参考。

据我所知，大科学家比如牛顿、爱因斯坦等，到了晚年大都信奉不可知论或神学。其实，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犹如一位幼童把手电光射向茫茫的夜空。夜空是我们要探索的未知领域，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不过是被夜空吞噬的手电光。数千年来，人类探知未知领域的路径和角度充满了随机性与偶然性，即使是我们长期研讨的任何一个知识领域，也未曾吃透和完全地掌握。不敢说永远，至少是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我们掌握的关于自然、社会甚至我们自身的知识，与未知的知识和领域比起来恐怕要少之又少。所以苏格拉底说：我知我不知。孔子也有何谓“知”的洞见。我觉得，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明白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对自然、社会、人事、心理等等都应该有起码的好奇与敬畏；在布满荆棘的探索道路上执着而坚韧不拔，并因此而实现生命的满足和意义。豪言人定胜天、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掌握“宇宙真理”者，是对常识和文明的挑战，与科学和学术研究南辕北辙。概言之，对研究对象的好奇与敬畏，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前提。

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对历史是否具有客观性却仍纷争不断。事实上，史学作品是史学家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逻辑，用自己选择的史料对“过去”的讲述。问题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主旋律”；即使是同时代的史学家，也有各自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价值观，自然就会写出各自的历史故事和不同的“历史规律”。这就使历史的客观性大打折扣了。著名左派学者、旅居澳洲的高默波教授对史学的这个特点倒是心知肚明。他说：“世界

上没有先天的、自然的、超越视觉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一些简单的所谓事实并不构成历史。比如说谁什么时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孤立地看并没有什么意义。流水账记录不是历史，历史是一种知识。……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

在《高家村》这本书中，高先生以自己家乡的材料证明了一个与主流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在教育普及程度、公共医疗水平、社会福利、文体活动等方面都远好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高教授宣称，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写《高家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同理，这也不同于过去的或现在的，受过打击的或没受过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立场和观点。”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历史著述其实就是撰写者以其串联的史料来表达自己利益的一种形式。声言自己撰写的历史“客观公正”、反映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历史学家或党派，肯定是别有用心的。正如高教授所言：“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中国当代史上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充满着争议，甚至是网络谩骂和暴力。历史的书写怎么能做到“客观公正”呢？

由历史著述的非客观性，自然会得出历史是由后人建构的结论。最近，一本叫作《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书在坊间被热炒。本书是1990年代初，主持这个官方史学工程的“两胡”就如何编好本书的多次谈话记录。记录人是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教授。该书书腰上赫然印着“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的问句，令人叫绝，点出了该书的要害。胡乔木认为，编写《党史七十年》“是要统一全党思想，这是个很大的事”。他甚至认为党史研究具有“战斗性”：“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

胡乔木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本党史的作者，深谙党史写作的本质与肯綮。他认为，“一部书应该是一篇长的论文，不可避免地带有论战性。”被赋予了“论战”的神圣使命，历史就只能也必须被“建构”了。所以，写党史“要提出一个能够贯穿70年的思想”；“要提出一些见解。没有见解，这本书人家就不要看了”。胡乔木这里说的“思想”和“见解”，就是“建构”党史的指导思想：“没有中

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通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其章节结构、历史分期、材料取舍、话语体系等，都是围绕着证明这个“客观真理”来刻意安排的。

对于不利于论证这个“客观真理”的中共历史上的“失误”，“两胡”都主张“不能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更不能将其作为重点来写，要“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语）。对于“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全国性的“浩劫”，胡绳要求撰稿人：“总的讲，‘文革’不过是个插曲，不能写太多的篇幅，不超过5万字”；“‘大跃进’时间还短一点，‘文革’总得搞一段，那就会影响一点科学性”。也就是说，“文革”这样的灾难，写得多了、研究得太细致了，不利于证明上述“客观真理”，会影响《党史七十年》这本书的“科学性”。这位官方党史的掌门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立场是旗帜鲜明的：“我们这个社会，渣滓相当多，如果动乱再延长，你看看。”

对于官方建构的历史，景军教授将其定义为“官方记忆”。景教授认为：“官方记忆的一个特点是制造敏感历史问题的记忆盲区。另一个特点是有选择地培养公众对某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知，以至于一系列被过滤或矫正的记忆被公众视为常识性知识。”历代统治者向来重视“官方记忆”的建构甚至是重构。被官方建构的史书却往往被认为是最客观公正的所谓“正史”。殊不知，官修正史对历史的任意篡改早已成“积习”。上世纪30年代，孟森先生论及《清实录》，指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都对前代编年大事记即官修“实录”，“欲改即改”，积习变成惯例，“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到了近现代，在古代本是分开的法统与道统逐渐合二为一，不仅“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任意篡改甚至伪造历史的“积习”则更加大行其道。按照官方要求编排的史著与教科书，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某一次饥荒等）和重要人物（比如某一位民国总统或某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或有意回避、淡化，或只重点讲述其某个方面，或干脆只字不提将其完全从史书中抹掉；对一些小人物（比如普通一兵或某个典型人物）和次要的事件（比如某一个小规模战斗或某一小型会议），则根据建构官史的需要，篡改甚至伪造史料，竭力渲染其影响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建构成政治的“婢女”，把历史完全神话化了。凡此种种，是不是在“建构”历史，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主流史学固然有“官方记忆”的特点，然非主流的学者亦不能免俗。不过他们很多人是以与官方相反的“见解”和“思想”来建构历史的，把“我们的历史”（胡绳对中共党史的称谓）偏偏说成是“一团漆黑”。一位西方有名的史学家，2010年出版了《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以下简称《大饥荒》）。次年该书荣获英国约翰逊文学奖，由此名声大噪。英国《卫报》誉之为“震惊世人的原创”。该书封皮上有张戎等多位汉学家的推荐，认为该书是“最为权威，最为详实的研究”，是“第一部”、“开创性的”、“治学严谨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改写”。作者声称掌握了大量绝密文件，其结论亦令人震惊。他认为，这次人为的饥荒直接造成4500万人死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相当，是人类史上继斯大林集中营、纳粹大屠杀之后的第三大悲惨事件。因此，毛泽东是“最大的杀人屠夫”。

《大饥荒》的作者称，该书最大的发现和贡献之一是找到了毛泽东在明知饿死人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草菅人命的铁证，即195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的“绝密会议”（即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粮食收购不超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孙万国教授的研究证实，毛泽东3月25日的讲话主要谈的是人民公社问题，根本没讲上面那段话。毛泽东的所谓“饿死一半让另一半吃饱”之说，是在3月26日下午4点20分后，在薄一波报告《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时的插话里提到的；而关于“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的内容，则出自3月28日李先念做《关于粮、棉、油购销问题和财贸方面几个问题》报告时的毛泽东的插话。可《大饥荒》的作者却将两份文件混编为一个。根据孙教授提供的文件，毛的原话是：“对工业，这三个月要确实的抓一下，要抓紧，抓狠，抓实。工业方面的领导上要出秦始皇。要完成计划，就要大减项目。1078个项目中还应该坚决地再多削减，削到500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不难发现，毛泽东所谓“不如死一半”的说法，是针对工业领域里的基建项目的。显然，《大饥荒》将大量的档案作为其建构历史的材料支撑，所谓的“开创性”、“治学严谨”等，不过是其建构的历史比较符合该书的宗旨和逻辑罢了。

也许有读者会诘问：上面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多数史家至少在主观上是努力要写出价值中立的客观历史的。问题是没有人能摆脱时代的局限、利益的缠绕。高默波教授认为：“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而且，历史往往是研究者先知道了结果，然后倒推过程、原因和意义的，难免“以成败论英雄”。中国共产党今日执政之地位，决定了90年前的中共“一大”必然被誉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其实在民国开放党禁期间，自发成立的各种党派达数百上千，怎么未见史学家像对待中共“一大”般地详加研究和隆重纪念？后人在史料中发现的所谓历史规律，史学家叙述历史的逻辑等等，本质上都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的一种个人、阶层、党派利益的表达，是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逻辑建构的。这就使史学陷入了真实的“过去”一旦被写到书上就不可能完全公正客观的困境。

这样的结论让读者对史学不免悲观失望。我对此倒没有完全绝望，认为只要能为学者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同时史学家们又能够对各种利益诱惑、政治高压等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抵制，参与史学研究的各路学者能够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也许就能有效地阻止史学完全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使史学著述能够逐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学术研究应该是无禁区、无顶峰、无权威的“三无世界”；因而，学术研究没有对错之别，只有观点的不同，自然也就不可能“统一思想”。换言之，被“统一思想”的所谓史学研究，不可避免的是一种政治宣传而非学术研究。事实上，任何一种史学研究的观点，按照秦晖教授的说法，仅仅是一种深刻的偏见。之所以冠以“深刻”，是因为其遵守了学术规范；若不遵守学术规范，就只剩下“偏见”了。史学进步的前提，是允许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公开、规范地发表自己“深刻的偏见”。只有在自由、激烈、充分地学术争论中，不规范的史学研究，与基本史实不相符的、荒谬的、非理性的意见自然会被鄙弃；符合学术规范的史学著述，才有可能避免更大的偏见，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

无须讳言，如果在学术研究中，只有一个结论是“唯一正确的”、“毋庸置疑的”、“无可争辩的”，所有的史学家、所有的历史作品的唯一任务，就是搜集各种史料去反复证明、不断论证这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其结果只能是思想大门的紧闭，将鲜活、多样、复杂的历史变成几条干巴巴的政治结论。这样的史

学研究不可能接近而只能远离历史的真相，甚至是对历史的伪造。这也就是笔者所理解的历史虚无主义。梁任公对此类伪历史著述早有警惕：“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布洛赫也说：“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

不同的时代、同一时期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打开自己的手电筒把光柱射向自己感兴趣的未知的夜空。怎么能强迫所有的人放弃探知未知领域的权利，将其转让给某一个人或党派，迫使全体百姓承认其找到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亘古不变的规律和真理？这不仅荒唐而且十分危险。I·柏林对此有深刻地见地：“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历史“决定论，虽然它的锁链上装饰着鲜花，尽管有它高贵的禁欲主义以及辉煌而巨大的宇宙设计，却把宇宙视为一所监狱”。上个世纪中国接连不断上演的浩劫，其思想根源基本上就是这种“唯一正确”的不宽容的一元论。所以学术自由虽不顶吃不当喝，但关乎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作为国家应该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表达，作为个人也应该容忍和宽容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

中共创建人陈独秀对此早有洞见：“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的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陈先生的意思是说，今天好的法律和制度，是因为昨天的言论自由；明天要想有好制度好法律，今天就得允许老百姓自由地发表意见。陈独秀同志在95年前就有如此识见，实在让吾侪相形见绌。

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要想使史学远离政治接近历史真相，史学家们还应该自觉地遵守学术规范。有人很不喜欢来自西方的这些学术“洋八股”，认为其过于繁琐，反而妨碍了自由地表达；有的学人甚至认为，没有这些西洋劳什子，自

己的作品照样“绝对真实”。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作品的写作理应遵守海内外学人共同认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实际上就是学者参与学术活动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只有当每一个学人都自觉遵守这些规则时，才能保证学术活动秩序井然和学术见解的相对公允。具体到史学研究，学术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史学家过于激进情绪的宣泄和过于偏执观点的表达；可以规范史学家对各种史料地整理、甄别与使用；可以使史学家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到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和谱系之中，在归纳总结前辈和同行学术成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研究的对话对象，就会很自然地凸显自己的学术贡献并避免学术剽窃等等。概言之，史学的学术规范很大程度上能是史学作品保持相对的价值中立，以使史学著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史学研究规范是一个大题目，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这里仅以近年方兴未艾的口述史学为例。许多学人甚至业内人士认为，所谓口述史学就是找到若干当事人，以“我说你记”的形式将当事人的口述材料，按照历史事件演进的顺序和逻辑（实际上是作者自己设计的顺序和逻辑）记录下来。其实，史学研究的经验和研究规范早有揭示，口述在一手材料中是不可靠甚至是最不可靠的。当事人在口述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或无意地“歪曲”历史真相；只有将口述史料与当时的文字记载（比如档案、信件、新闻报道等）和实物史料（比如生活用品、各种票证、当时的器物等）相互补充、印证和互证之后，才能尽可能地接近或复原历史的真相。当然，在多种史料的互证过程中，史学家的史识、学养以及搜集、整理和剪接史料的技巧等，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质言之，仅凭口述史料这一种史料写成的所谓口述史，按照一般的史学规范，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

著名口述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学实践证明了上述判断：“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补充资料与考证而成的”。照此理解，口述史学的真正内涵，显然不完全在于“以口述史料为主”；而更在于历史学家根据研究命题、路径及方法的需要，同时选用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并将它们相互对证，最终能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并证明作者的理论假设。唐德刚的另一部口述史学著作《张学良口述历史》，便是“以口述史料为主”，主要采取“你

说我记”的方式编纂而成的。由于缺少了作者对口述史料的“考证和补充”，就史学成就而言，显然不能与作者的另外两部口述史学著作《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比肩。这一点，就连作者本人也是承认的：在写作《张学良口述历史》时，“全凭记忆执笔，冰天雪地，连身边所积，盈箱累架的史料，也无力翻查。……至恳知我的编者读者，赐谅赐恕，为幸为感”。

我觉得，无论是搞自然科学的，还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最好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无知，更要警惕自己对所谓“科学”的盲目自信；作为史学家，还要对历史学科能否揭示历史真相保持足够的审慎。要谨小慎微，规范研究。如果自认为自己资质一般但有一定的史学学养且能够做到研究规范，态度认真严谨，这样的史学家一辈子能写几篇自己满意的文章就应该满足了。史书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那得有相当的积累、思想和睿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史书了。

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云：“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之社论时评。”史学研究本质上是对今日生活的观照和评价。所以，史学家首先应该是热爱生活的。布洛赫曾说过“和亨利·皮雷纳一同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轶事。刚到那里，他对我说：‘我们先参观什么地方呢？好像那里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厅，我们先看看那里吧？’似乎是为了打消我的惊愕，他又说：‘如果我是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布洛赫本人在德寇入侵自己的祖国时，毅然投入到抵抗法西斯的地下战斗中，1944年被德军枪杀于里昂郊外。正是对生活的挚爱，布洛赫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依然对史学的前途抱有信心：“‘过去’就是以后不会改变的资料。但对过去的认识却在逐渐深化，这种认识时常变化，并日益完善。如若不信，就请回顾一下近一百多年来的进展吧：许许多多人类活动的领域已从黑暗中显露出来，人们已揭开古埃及和迦勒底神秘的面纱。”我相信，随着学术环境的逐渐宽松，再加上后学们勤勉努力，历史的大体轮廓还是能够显露出来的；只要历史显露出本来的基本面貌，它就会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影响今天的生活。因为，思想界的革命、社会的巨变，往往是从重新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开始的。■

【札记】

阅读与思考**——有关“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

马昌海

一、官僚资本主义的概念

“官僚资本”的概念，是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发表的《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第一种官僚资本是清末洋务派的官办企业；第二种是官商合办企业。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那时候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王亚南分析中国的官僚资本有三种具体形态：第一种，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资本（私有财产），就是官僚自己举办的那些企业；第二种，是官僚使用的资本，就是那些由“公家”（国营或官营）举办的企业，官僚作为实际经营者，对于此类资本经营并无所有权，但有运用权，并不是私有财产；第三种，是官僚可加以控制的资本，就是在多方面受官僚制约的私人企业资本。这就更不是私有财产了。这三种具体形态，第一种（所有权）直接为官僚所有；第二种（使用权）、第三种（支配权）不是由官僚直接占有。官僚“对公营资本作自利的运用，对私人资本作自利的控制，无非是想使其所有资本形态迅速扩大起来”；但如果没有后两个资本形态，“第一个资本形态，也许根本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成形为官僚资本”。因此，“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形成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

国民党早于毛泽东使用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概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后，面对日本战败留下的各种产业和物质财产，国民政府却没有接受“敌产”的统一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而是党政军警等代表不同权势利益集团的各部门各单位多头齐下，争先恐后，相互争夺甚至发生严重冲突，因此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许多地方甚至随意假借军管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名，抢占房产，强行抓人，

“接收”各种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有关规章就不健全，实际上无人执行。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军队、海关、警察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就更加便利。

面对这样混乱不堪的局面，蒋介石和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决议案提出了一系列“革新”决议，列举了几十条“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就是“清查战时暴利之财富，课以重税。清查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中央日报》提出，要“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内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正式宣布官僚资本的死刑。”稍后，《中央日报》发表《向官僚资本主义宣战！》的檄文，义正辞严地主张，要用调查、告密、陈报、清查等方法，尽快查明“谁是战时暴利者”。“谁是不法的接收人员”。然而，面对庞大的盘根错节的权势集团，国民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严厉全面的“改革措施”无功而返，不了了之。官僚资本恶性膨胀的政治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概念做了明确地阐述：“四大家族，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的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主义。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两个特征，一是企业由国家创办，二是垄断。有些人夸大了“官僚资本”的用法，将四大家族及其他官僚、军阀的私人资本也算做官僚资本的一部分。就经济学概念而言，还是将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区别使用为妥。

因为官僚私人办企业都和国家政权有不同程度的结合，但哪些官僚办的私人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哪些不是，难以区别。而且政府办的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并不是某个官僚所得以私有。更何况官僚资本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通俗名称”，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概念。至于那些官僚、军阀利用武力和政治特权搜刮得来的资金而去投资创办的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定性？仅仅凭他们原始积累的来源就能够决定其所办的企业是官僚资本吗？民族资本是相对外国资本而言的，而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一样，当然都是由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这两部分组成的。官办资本主义企业和民间私人资本这两种形式性质各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同。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私人资本由于其所有权在私人，必定产生与之相应的资本家阶级。而国家资本由于其所有权在国家政权，它不可能形成一个相应的新阶级。凡是经办了国有企业的官僚，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官僚的私人投资，在资本形态上和一般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私人投资具有同一性，对其政治特权、依赖外国等问题，必须从历史背景、经济环境的角度予以阐明。

二、官僚资本是否有积极进步的一面？

有人认为：其积极作用在各历史阶段情况有所不同，要作具体分析，如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曾起过积极作用，并没有破坏社会经济。

还有人认为：对抗战时期官僚资本经济应一分为二，对官僚资产阶级兴办的企业有支持抗战的作用也不应避讳。抗战初期工厂内迁与大后方工矿业的发展，主要就是借用了国家政权的力量。黄立人的研究说明，国民政府对国营厂矿投入了大量资金，对西南后方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认为蚕食鲸吞民营资本是官僚资本的重要本质特征，官僚资本在西南诸省对民营资本的吞并和渗透是骇人听闻的。丁日初认为：抗战时期国家资本在金融、工矿、贸易三个领域都有有利于抗战和国计民生，而且“是主要的一面”。从战时经济的现实状况来看，国家金融资本的加强，不但使战时财政得以统一调度，更重要的是对后方工农业的贷款起了扶持生产的作用。在工业方面，私人资本一般没有能力在后方广泛投资，唯有依靠国家资本才有可能奠定后方工业基础。国家资本接办一些陷于困境的私营企业，是出于私营厂矿的主动申请和要求。与其

让企业垮台，还不如让国家资本收购续办为好，企业得以摆脱困境，生产得以维持和发展，简单的用“吞并”两字概括，显然是有失偏颇。因此，说抗战时期国家资本是买办的封建反动生产关系，“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七七”事变以后的政治结构是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在抗战八年保持这一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吗？持续政治上进步、经济上反动这样一种对立局面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

综上所述，对官僚资本全盘否定显然有失偏颇。

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说法难以成立

1. 什么是经济金融界的“大家族”（Biggest Households）？

如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 family）、摩根家族（Morgan family），他们的共同特点是：①某个血缘家族拥有控制经济命脉的巨大产业为私有财产，如摩根家族包括银行家信托公司、保证信托公司、第一银行等，总资产 34 亿美元，摩根同盟总资本约 48 亿美元；②几代人延续发展下来才形成大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发展到现在已是第六代。

1946 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中，首次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列为“四大家族”即四大财政金融寡头。他提出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中饱私囊，并估算“四大家族”侵占的资产达 200 多亿美元。而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才 16 亿美元。

2. 国家垄断资本并不等于某个家族的私有财产

必须把国民政府名下的国有资产与各个家族私人的资产区分开来，必须把国营产业与“大家族”的私有产业区分开来。有些人担任公职、领取公务员薪金和津贴，另一方面这些官僚又经营自己的私有企业。如果“公私不分”，就会造成贪污、受贿、盗窃国有资产罪，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官僚资本是通过“党政军”（一党独裁、专制政府、党军）的统治手段控制经济的，党政军领导集团共有经济利益，资产属于集团共有而不是某些家族私有，形成既得利益组织关系的“集团”，而不是血缘关系的“家族”。这显然不是家族经济的典型。

3. 宋家和孔家的私有企业很多，蒋介石名下则没有什么企业

宋家（宋子文为主）和孔家（孔祥熙为主）是名副其实的“亦官亦商”的大富豪。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乃至蒋介石父子，则主要是国民党政治人物。当时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姻亲孔家财”，这就表明：蒋介石掌握天下大权，陈氏兄弟掌握国民党的党务，蒋和陈两家本身并没有直接占有多少产业。其次，宋子文（及宋子良等）和孔祥熙（及宋霭龄、孔令侃等）初步形成资产大家族的雏形，但是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他们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地盘，最后逃往美国，经营一些房地产和投资石油天然气等，后继无人，一代而竭。

蒋介石“本身只有很少的私人投资”，“蒋的产业大部分与孔祥熙合作，蒋夫人则是通过孔夫人而经营其财产的。”宋美龄与美国陈纳德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拥有包括陈纳德的空运飞机在内的运输队伍，总公司设在上海，各地有分公司，进行中美之间的进出口运输，实际上是一个中美合资企业，宋美龄入了股。但蒋介石有军人的习惯，物质生活并不奢侈；宋美龄也爱权大于爱钱。蒋介石、宋美龄有多少家产？还没有公认的确切结论。就是有投资的宋、孔两家，“在国内资本有多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多大程度的垄断性消极作用”，亦应当“根据足够的材料做出符合客观真实地分析和论断”。

4.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财产不够资格列入“大家族”

无充分的资料证明二陈私人投资创办了垄断企业，他们也并没有多少资产。陈果夫（1892—1951年），浙江吴兴人，是国民党元老陈其美的侄儿；曾与其弟陈立夫一同从事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陈果夫久有肺病，到台湾后经济困难，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补助，但于1951年8月28日病故，终年59岁。

陈立夫（1900—2001）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的首领。1949年12月去台湾，后来离台赴美，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1967年偕夫人返台定居，推动中医之学，无力过问政治。

因此，丁日初认为中国并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从政治方面看，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掌握党、政、军、财、经大权的四大家族，然而从经济方面来看，那一时期却并没有产生四大垄断资本家族。”

建议今后在学术上不再使用“四大家族”的术语；官僚资本也不要跟所谓“四大家族”混为一谈。■

【札记】

读萧军《延安日记》笔记（三）

——萧军在延安时对党人的观察与期待

胡庄子

“我先要懂得共产党,因为它是这时代最复杂最重要的一团”。(43-3-1)

萧军是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而来到延安的。“对于国民党,我一定要拼全力消灭完它”(43-3-28)他来到心目中理想的延安,首先要与中共相处。他在最近的距离上观察着这个党。他在日记中记录着他的观察和思考,以及批评与期待。

他说:这里开始制造“谀上”的传统。……“当差”的风气在这里很盛行,一些人们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然后慢慢地爬。这种新兴的官僚主义是革命前途一种暗影。(40-8-15)

他说: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这两个党里面留下的,恐怕只是一些一般的人!我感觉党的方面,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官僚主义,人情主义的气氛很浓厚。为了一句普通的话,他们可以毫无怜惜地使一个易感的女同志哭两天。(40-8-15)

他与机关的门卫发生冲突,他激愤地写道:我的心受伤了!我感觉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那是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信任他们对于老百姓不欺压!因为仅仅是在他们“中央”的门前,全是如此,其它地方不问可知。如果在别的地方他们一定要殴打我,而后不认账,还要添上一些侮辱的东西!我虽然懂得他们,但我的感情再也不能原谅他们了,我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给与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脏监狱!因为是我的敌人!我不愿再在这里受“优待”了!啊!丑恶的东西们再见罢!让我到“地狱”里去生活吧!我愿意在那里战死,也不愿意在这“天堂”里生活。(40-9-7)

他说:他们全是“党人”,他们不择手段,他们是要拥护自己的——即使是可耻——利益,毫无正义感和公道心的。(40-9-8)

他说：我现在还是爱着，帮助着他们！也许有一天我不再爱他们了，到他们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堕落下去的时候，我要毫无怜惜地攻击它，因为我也人民。

（40-9-26）

他说：革命政党中的卑恶分子，那是应该和他斗争，但不能牵涉到党！美丽之中一定要有丑恶的东西存在；常常是美丽的花朵要从丑恶的粪土里生长出来。共产党人他们有的伤害我，侮辱我，忽视我……这不能动摇了我对于这党的本身有什么不信任，越是感到这中间的卑丑，庸俗……危机……我似乎更不能放弃它……我要斗争！我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现在的本身存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的较好的人；他们的能力也只能到这样的限度了。他们还正在学习着，进步着……，不过在客观方面他们是行走得太慢，行走得常不正确！我应该比他们更进步……更走向他们前面，更加紧学习。（40-10-1）

他说：我憎恶那卑俗的人形，他却偏要在我的面前摇来摆去，握手，说笑，吸烟……我憎恶那“特殊”的席位，我却偏要被勉强地坐在那里……总而言之，这样一卑俗的地方，这是没有我去厕所所愉快的，在那里我可以看日落，流水，远山……。我憎恶这一切，却要忍受这一切……。我虽然努力要从那些革命党人的身上发现一些值得我描写的东西，他们全是一些认真为革命工作的人，这一点我佩服他们，敬重他们，但是我一点也不爱他们那缺乏一种美，一种能够唤起我美的情绪的东西。他们的仪表没有风度；他们的言词像铅字一样不深刻，平板，无味。正因为中国反革命的无能，无天才，所以这些革命党人也无能，无天才……我这是浪漫式的想法！（40-10-7）

他说：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40-10-8）

他说：这里的人凡事全乐意列名而不工作。（41-1-15）他们空泛地称赞那些首领，似乎在装饰自己。（41-1-20）对于党人，我的态度此后采取：只有事务联系，不作私人友情的交接。（41-1-22）延安无舆论，从我这里就要建立舆论。（41-2-1）他说：（苏共）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中国也正在进行这现象，这是奴性的表现，我反对它。这使人会联想到，只有政治是重要的，光荣的，伟大的，别的似乎可以不存在了了。这可以使人们

引起两种心理：一种是积极地作一个政治投机家，以遂行自己虚荣的心理；一种是引起一种消极的厌恶，我是近乎后一种的。我决定，凡是政治上他们自己歌颂的人物，我就不再去描写他们，我要描写那些不被注意的人们。（41-2-5）

他说：我只有残酷和坚强地和一些“丑恶”战斗下去以外，我不必再在他们“党人”中寻找什么“友谊，公正，同情”。（41-2-13）他说：对于此地的气氛我是不惯的，迟早我必要离开，它妨害我精神上的自尊。他们——党人——总有一种帮忙别人，养活别人而不是别人帮忙他们的意识，这是可悲的。我和党方面不会决裂，但也不会十分好起来，有一些气氛我感到痛恨，正因为我对它有期望。我不愿意像一个“士”似的那样被别人豢养着，我能养活我自己，我要建立自己的精神领域。……我不愿像三国时代那些‘士’似的在一个据主的下面生活着，像一个属员。……我是个作家，我不独推进社会，而且要监督社会，我要和任何人平等，我不想领导人，但也不想被谁领导……在这里看来很自由，但我精神上受到压抑……这里“权位”的气氛太浓厚了。（41-3-7）

他说：这里一般是喜欢用政治的刀子去随便解剖艺术作品，……总之，他们看问题是有限度性和片面性的，我应该和这些倾向战斗。党性是需要，但行帮习气是不需要的。（41-3-20）

他说：一个人底反叛，那原因决不尽是一面的。我对于作叛徒的人固然不爱，而把一个人逼成叛徒的东西——人或制度——比叛徒更加可恨。（40-9-25）对于叛徒叛变本身固然可恶，而促成一个叛徒的原因更可恶。（41-3-20）

他说：总之，①现在一些党人共同作风：对人态度不诚恳，想法抵赖掩饰自己的过错或者批评。②俨然以正统自负，虽然表面上是谦卑的。③狭小，主观夸张自己，压倒别人。④喜欢居功，不肯卖力。⑤时时以领导者自居。⑥不求上进，依赖党，结果作为党的附庸者。

他说：对于一般“党人”我决定采取尽可能不接近主义。当我懂得他们了，就不再气愤。原因过去我是把他们“平等”看待了。人对于高一点或低一点于自己的人，全会让步，只有对于“平等”的人才竞争着。（41-6-18）他说：我在此地只是感到一种愚昧的空气窒息着人。他们常常是把一些忠诚而有用的人，不会爬的人，投进阴沟里去，让他去像一块无用的铁似的，腐烂和毁灭！他们不懂“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扬一个党人或非党人的长处，有用于革命，他们只

想用可耻的繁琐的仪式，纪律等等，消极地把一个人的生气和个性消磨殆尽。这是可悲的现象，我担心着中国的前途！有多少人又将要死于这“愚昧的错误”上了！我现在将怎样呢？这样下去会把自己变成“愚昧”了的。（41-7-4）

他说：看得出她们的潜意识里还是为了打天下将来“分不杯羹”，她们全等着革命成功“作功臣”，可叹！（41-7-6）

他说：在这里党人与非党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鸿沟……对那些阻害党发展的人，我是痛恶的。靠党穿衣吃饭，借党光荣伟大起自己，以执鞭拿剪以磨杀新同志的个性和锐气，而不懂升发……的人，这是可恶的。……那些从事政治的人，应该也用些功理解解自己部门以外的事，不要尽叫人理解他们。这里的人是僵化的，进步性太慢。（41-7-12）

他说：我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我是抗议这样执行“原则”的。（41-7-23）

他说：立法的人总是善面的；执法的人总是恶面的。所以上层容易市恩，下层容易贾怨，这也就是人们只看到杀人的手，没有看到操刀的“人”。（41-9-4）

他说：这是和国民党差不多的，有时甚至还不如国民党：小气，自以为是，官僚主义……。既然这样，还要这个党做什么？终于勉强自己压下了感情，思量着：“中国是个不健全的国家，中国的党也是不健全的”，这是毛泽东和我说过的。我就根据这话，来寻找自己的结论！（41-12-21）

他说：共产党它虽然名义和方向上是无产阶级的党，但它的主要内容和领导者，确是小资产阶级的（既无资产阶级的科学化能力，又无无产阶级的坚决，敏捷，英勇），它的成分封建，资产，无产，小有产，每一成分几乎以均等的数字存在着。而起得决定作用的，却还是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亏损，在此过渡期间，显得彷徨，无能，迟滞，杂乱……。……不信任，憎恨，悲观，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感情！我总感到它在有暮气了，它似乎需要一个大的改变底到来。他是不坚强的，松弛的，自发性的……。……（41-12-21）

他说：我必须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建立我自己。我对于一些共产党人，一天天抱着冷淡，甚至对于整个的党，我也失掉了热力。我们是疏远了！（41-12-24）

他说：我可以一生不做为一个党员，但我却应该理解共产党比他们自己更清楚些；比一个十足的共产党员的品质更要完备些。（42-1-27）

他说：国民党把我看成“敌人”，共产党是把我看成“家族以外的人”，我在这中间被打击着，但我决不依附于谁，要走自己的路。（43-6-3）

他说：我对于共产党，如今只有一种理性上和勉强地合作，他们使我在感情上产生了离心力！含着眼泪和他们合作，但一有机会，我就要离开他们远一些。（43-10-20）

萧军直接对毛泽东说说：共产党如果有基督徒那样宣传精神就好了！还要有行帮传授人的方法，所谓开心见胆。（42-2-10）

他说：当一个人入了党或做了官，他们不变成自私、污蔑真理、只看到权势的人是极少的。最痛心是看着一个自己提着耳朵拉起来的人，这样堕落下去，是痛苦的事！“我生了你，也打死你！”夜间我思量起布尔巴这句话。（42-2-27）

他说：一般的骗子只是骗个人的钱财或东西，损失的也只是一个人或两个人……革命的骗子却要骗取别人的血，别人的脑袋，革命的时间……所以后者就更不容赦。（42-6-2）

他说：为了政治我虽然可以原谅他们，但在作为一个“朋友”，我却失却了对于他们尊重的感情。同时我对于那些党人，在心中降低了一格。为了艺术的前途计，他们就是把死人说活了，我也决不入党。这一次我学了一次乖。（42-6-22）

他说：我懂得了一些党人们存在一些自发、自足、夸大、闯运气的作风，从这些人之中，我也懂得了自己。……路上我想着，我决不能成为这样“家族”的一员，他们只能留下一些二流货。对于这个党，我一天天将要冷淡了我的热情，只是在理性上和他们在结交着。（42-6-25）

他说：共产党正在被一些无远见的，表面谦卑而实骄傲的人们统治着。毛泽东是个感性的人物，不是一个深刻，切实的人物，他是明敏有余，思考的远见不足。他们将来也会感到自己的落伍。也许还要有一些很重的跌伤。他们的向心力是表面的，薄弱的……我当然不忽视各方面条件和历史，但中央一些领导的人物如能更强健、雄浑，中国的共产党将会发展得更可观些。这是证明他们平常修养的不足和“自满”的表现，他们还有很多自发的、农民性的自足，这是不足以对付将来的。（42-7-9）

他说：忘恩性是统治阶级最大的特点。因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无何情谊言，所谓“用人朝前，不用朝后”。自从到延安以后，对于这忘恩性就更看得分明。

（42-9-23）

他说：我对整个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无意见，只是对于借党为硬壳防护自己而营私击人的坏蛋们，我不能饶恕！（42-9-14）

他说：（批判王实味、整风后）每个人之间全垒起了一道“墙”，至少人们之间不如去年热闹了。（42-9-24 中秋节）

萧军在日记中这种毫无顾忌的评说，难免会流露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他日记中的一些话本来也就是日常的记录。萧军的言行，自然引起中共的关注。舒群告诉萧军说：康生在“关注”你。并提醒说：“你也自己应该想下一啊，比如康生，他谈到你，怕你对他有误会，希望什么时候能到他那里去玩一次……”萧军说：“我对他没有误会……”（42-9-14）

他说：共产党有些地方缺乏一种连续性的执着，冲动性大，机会性大。总之，农民性、封建性、游击性还残存得很厉害！（43-6-21）

他说：我很慨叹他们内部缺乏深刻、卓越、远见的人！狭隘的行帮气，既无能又无才，对中国各个方面知之不深很少……。我默默检点了一下党中一些要人，有卓识远见，雄谋大略，深沉果断，明察意志的人还少发现。使我感觉缺一种吸人的雄浑的气氛和大热力！这也许是我的短见。（42-11-30）

他说：无论什么，总是要尽可能袒护自己的党员为原则的，除非不得已，或者犯了党底错误，他们总是用“自我批评”来遮过这一切的。（42-3-31）

萧军谈了自己对政治与个人的理解：要完成一个建筑是政治的目的，其中偶尔牺牲一块砖瓦，这是平常的事，如果你不愿被牺牲——如像是一块有文化、美术或历史价值的砖瓦——就可以躲得远一些了。（42-3-31）

他说：今古政治上有一个通则，就是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或消灭之，这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再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为无论任何帝王、政党所不易的原则。我正缺乏这品质，所以我愈感到自己离政治漩涡再远些。这也算是明哲保身罢。（41-4-24）

他说：共产党目前的特征，还是有“自发主义”性。执政者多属湖南、四川、江浙人，他们的性情也容易影响他们政治作风。湖南、四川人失之执拗，浮动，

江浙人失之狭小，虚浮，清谈。均缺乏一种雄浑的、沉潜的大力的东西。现在这个党正需要这样一种东西了。（42-11-5）他说：共产党的浅浮性我是懂得了的，虽然在理性上我尽可拥护，承认他们一切政治上的措施，但在感情上我是不容易和解的。他们自大，摆架子，但我也决不让步。（43-10-4）他说：共产党人一贯的战法：利用矛盾，争取外援，临时拉拢，鼓励对方，拖之冷之使其就范。（43-10-6）他说：卑俗的政治工作者们，他们是只看到艺术对于政治的宣传性，没有看到它另一方面的指导性——这是可耻的领导欲在作祟！（43-8-6）他说：我虽然含着眼泪与他们合作，拥护他们……但我不爱这类狭小、自足、刁滑、卑俗的小官僚们的。（43-8-26）他说：一般共产党方面论战的文章、态度全流于轻佻，浮薄，类乎女人骂架，缺乏一种深沉、词严正义的在精神上给予自己队伍、第三者、及敌人心理点头的力量。这不是一种正路，要堂堂作战。（43-8-26）

他说：这乡上的干部——乡长，指导员等——几乎全是流氓成份，鬼鬼祟祟，全无正气。因此我想到，共产党如果不认真励精图治，训练、筛选、提拔……它负起改造中国的大任是不可能的，将要有新的力量代替它不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那是不能谈的。吃着老百姓的公粮，而不给老百姓办事——这是可耻的啊！（44-2-25）

他说：无论如何，……在对于一般共产党人们，我是只有理性上的结合，没有融合无间的感情。（43-7-18）他又表示：我一定要为保护这个党，这个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而战斗，经过任何损害与挫折，决不灰心。（43-7-20）萧军认为：“我对中国共产党起了改造火种的作用”，“推动影响了共产党底整三风，文艺政策的产出。”（43-6-15）他在读了《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书后认为：这是世界上从没有过的艰苦的党！我应该好好地帮助它，维护它，但对于一些坏蛋应该不容情。（43-10-27）

1942年，延安流行着萧军的一句大话：“我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11月，有人问萧军是否说过“一支笔管两个政党”？萧军说：记不得了。同时他反思：此后对任何人说话，我全应该检点。（42-11-15）……萧军的意见，犀利，不乏透彻，当然可能也有“隔”。无论如何，这种难得的声音值得一听啊……■

【访谈】

郑仲兵口述

——文革之我见

戴为伟 采访撰写

时间：2014年5月28日

地点：北京朝阳区郑仲兵家

受访人：郑仲兵

主访人：戴为伟

记录方式：录音及笔记

戴：我前些日子采访了一个北大1960年代初的高考状元，他是北京男三中的学生。他跟我讲，其实做北大文革，究竟两派怎么斗的，他们有什么思想分歧，因为分歧产生过什么具体的矛盾，出现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些意义都不大。因为他们都是被利用了的工具。最主要是在北大文革中，会有将近70个人死掉。他说，其实你们可以把这些事情，有些不清楚的，弄弄清楚。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郑：对。其实如果能写写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是很有必要的。

戴：有自杀的，有被整死的，梳理出来好像是63个人，不到70个人。这回第一期里，也有人写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准备把这些都不断地呈现出来。我看北大的大事记发现，北大的文革不是从1966年说，就能说清楚的，它有许多事情牵扯到1964年的社教运动。我看过聂元梓的回忆录，我认为她后来对当时的认识，似乎并不很清醒。

郑：对，不很清醒。

戴：因为她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醒，就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郑：看过他她？的回忆录后，我曾对他她？说：你不要怕什么，你要诚实、勇敢地说出你亲历的真相，无非“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吧。但也不是说凡

事皆错吧。比如九届二中全会时，你就是反了江青，反了张春桥，何必回避呢！

（笑）林彪也就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与毛的矛盾公开化。九大（矛盾）已经开始有点公开化，到了九届二中全会矛盾爆发了。我看还是有一定正义性的。

戴：既然说到林和毛的矛盾，顺便请您谈谈看法。

郑：其实，就林彪而言，哪里是到九届二中全会才跟毛有矛盾？现在很多评家都在胡说八道，其实很多矛盾本来就有。诚然，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神化毛泽东，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起过不可推诿的历史作用。但是，如果考察江青、毛泽东和林彪文革中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林彪当时确实是军头，他是接班人，是掌管军队的人。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毛当然不爱听这话，他说缔造者怎么就不能指挥？

毛的五七指示，是跟林彪说，军队要支左，搞三支两军。结果林彪支左了吗？军队在文革里，基本上是支右，支持保守派。所以毛泽东在武汉“7·20事件”前，他要谢富治、王力他们去各地做工作，要武装左派。那么，毛明明要你去支持左派，你军队竟支持右派，林彪有没有责任？以致出现了武汉兵谏事件，虽然是由陈再道出面，那林彪有没有责任？当时哪里是一个武汉军区（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整个军队的倾向。我以为这是二人矛盾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武汉事件，毛吓得要命，从来不坐飞机的，赶紧坐飞机跑到上海去了。这边，在北京开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像盖世英雄那样对待。那边，毛思量再三，却把王关戚抛出来了，罪名是“毁我长城”。把反军队的罪名加给他最心爱的、最忠实于他的人。毛吟咏了罗隐《筹笔驿》的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戚本禹听到以后，以为是把英雄这个帽子加到他头上。哪里是这样，毛泽东是在讲一种宿命的东西，就是为什么在我顺利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成；在我背时的时候，我怎么努力也不行？他当然很痛苦：亲自缔造的军队都反对我。

所以，毛不是到九届二中全会才与林彪有矛盾。实际上再早，“二月逆流”时期，就有矛盾分歧了。“二月逆流”明显的后台是周恩来，实际上更深的后台是林彪。如果没有林彪的态度，那些老师老总们谁敢？因为他们骂的是江青、是中央文革。林彪（曾经）把江青叫到家里去，两个人就吵起来，林彪把茶几都给掀了。（这是1966年的事情）“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委扩大会开始。所以可以说，林和毛当时就有矛盾。

所有跟江青过不去的，都是跟毛过不去。毛就是这么看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所以谁要反江青，就没有好下场。一开始陶铸是这样，后来“二月逆流”老师老总也是这样，再后来林彪是这样，最后邓小平也是这样。毛泽东那么喜欢邓小平，让他复出，让他替代周恩来，可是他反了江青以后，毛就认为，你就是反对我，你就是对文化革命不理解，你就得下台。

戴：照您这么说，那林彪1966年就开始反对毛泽东、江青，有这样激烈的冲突？

郑：那当然也不是太激烈，就是有所抵制。因为（林彪）太了解江青这个人了，林彪也了解毛这个人。恐怕党内高层了解毛泽东的，除了周恩来以外，就是林彪了。但是林彪跟毛又是一个宗派的，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他还得跳出来替毛泽东说话。但是到了文革，关系变了。以前他比较超脱的时候，包括七千人大会，毛等于是受到围攻，刘少奇对他都不客气。这时候，刘亚楼、罗瑞卿这些人就去找林彪，要林彪出来说话。林彪就出来讲了那么一通话：不是主席的错误，而是你们没听主席的话。他倒过来说。毛听了很高兴，把局面扭转过来了。就找罗瑞卿，说，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吗？罗瑞卿赶紧说：不能，我说不出这么好的话。

到后来，文化革命，他是二把手。你干不干，我就把你绑进来了。一直到“二月逆流”的时候，毛明明对林彪不满，他还对那些老师说，你们不要逼着我和林彪两个人再重返井冈山，去打游击。（笑）就说给那些老师老总听。

戴：您怎样评价文化革命中的林彪？

郑：2012年春我在讨论《邱会作回忆录》的会上，曾就林彪和文化革命问题谈了八条看法。你们可以找来看看，今天就不赘述了。如果要补充的话，我想说，即便是林彪主政中国，而体制不变的话，中国也好不了。中国很可能会堕入层层的人专政。九大以后各级革委会的头头及其主体几乎都是军人和军队。文化革命中的军宣队和军管，他们所作所为大家都领教了，那里做过什么好事！

戴：很想听听您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认识。

郑：我认为现在对文革的反思，即认识，总的来说都很不到位。究竟反思了什么？虽然组织了一些材料，但如果说对文革反思深刻，应该看到，文革本身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很集中地来表现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因后果、兴衰成败这么一个缩影。

戴：您是这么看，我又想起我父亲，他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被共产党的领导人欺骗的这么一个过程。

郑：可能你能感受到，因为文革中提出过一些在共产主义运动不同阶段都提出过的问题，而且这种斗争也包含着许多，如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种思潮，都在那时翻卷。如果真正反思透彻，就应该认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是人类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没有办法避免的一场历史灾难。

戴：文革初期毛说过，过去搞过许多运动，都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搞文化革命（如红卫兵运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郑：历史本来有它运行的自主轨迹，但人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历史。这个人呐，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包括纳粹主义也是人想出来的。当时也许就认为，这是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良方妙药。本来人有任何意见都是应该允许的。但是因为中国这种体制，就是专制体制，它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它只能让一种意见存在，其它意见都要消灭。所以就不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切磋和碰撞。作为决策来说，就是权威人士拍脑袋拍出来的。对于社会思潮来说，他们就采取了独尊“毛”术，罢黜百家的办法。这就没办法了。这种社会，就没有一种正常的文明可言，思想很难有所发展，这是很恐怖的事情。这就是专制主义的特点。如果不是专制主义，可以避免很多事情。人们往往不明白，为什么要革命？其实革命是专制主义逼出来的。虽然革命往往也没有好结果，不仅解决不了革命想解决的问题，而且后遗症很严重。但它是被逼出来的，包含有一定的正义性。就像人被欺负到顶了，没办法，豁出去和你拼命，拼个你死我活一样。

如果社会有调节的能力，可以把问题公平自由地拿出来议论，那么就不需要革命。如果还有社会多数人的选择，那就更不会革命了。不管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茉莉花革命”，都是在专制体制下产生的。

戴：文化革命不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吗？

郑：当然是。但是对于文化革命，我跟许多人观点不一样，因为我认为文化革命爆发的过程，颇有点像“右派向党进攻”。“右派向党进攻”，也是在社会危机很严重时，毛泽东说要帮党整风，人们就把对共产党的意见说出来了。共产党接受不了比较尖锐的意见。本来对这些人就不放心，或者是对相当一部分人不

放心，就借着机会，都把这些人打下去。党内（提意见的人）也一样，你们还居然跟着党外一些人这样提意见，当然我更得从重从严来处理了。

文革为什么一点就着，那么多人参加？恰是在反右十年之后。这十年，比头十年要坏得多，1956年以后就是赤裸裸的一党专政了。你想三年困难时候饿死那么多人，这时候，你说要抓走资派，当然有一定的号召力（笑）。所以，你说反走资派，我就反当权派。反正，我对这个政权有很多意见。毛说要反修反修，说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我就认定他们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把他们打倒。当然也有人保护，因为有1956年的教训。当时确实共产党作恶多端，所以一点就着。

但是毛泽东的厉害就在于，当邓小平、刘少奇他们还想重演反右那一幕的时候，毛泽东干脆说，给学生“四大”。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当时）确实都感到那种空前未有的自由。让这些年轻人无法无天，去折腾他们（走资派）。还美其名曰，干部都要受这种反修防修的锻炼和考验。但是正因为是这样，放开以后就没法收拾。而且以什么为准则？大家都说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毛泽东思想本来就是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专制而混乱的东西。年轻人认为，只要拿到毛泽东思想，我就是正确的。可是，他（毛泽东）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保守派拿到他（毛）保守的言论，造反派拿到他激进的言论，就变成势不两立的各种派系，就在那里打（派仗）。在这期间，毛泽东以为他找到了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如官僚主义，如腐化堕落）的办法。他也看到这种体制的弊病。但他的问题是，他不可能也不愿意改变这种体制，他只是想，除了我一个人专制独裁以外，别的人谁也别想专制独裁。

可是这点是很难做到的，大家当时虽然只信奉毛老人家一个佛爷，可是共产党的道统，专制主义是要通过层层官僚来实现的，这样做，就必然造成社会的无序。所以他就着急。在着急的过程中，他又看到还有反对文革的，他就想赶紧把这股势力压下去，但压不下去。所以他就放弃了，回过头来压制这些他原来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就是压制这些他曾经给予过民主自由的学生，重新又把学生关到笼子里头去，而且把他们整得很惨，把他们出卖了，重新开始用工农兵。

这时就表现出工农和知识分子的不同，知识分子有理想、理性；工农由于文化层次的问题，他们更习惯于被统治与服从。所以大部分的工农是偏保守的。士兵又是工农组成的。再加上上层，本来就出现了分歧，所以毛在武汉（1967年

“七二〇事件”）挨了一棍子，那是把他吓坏了。毛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就表现在这里，遇到这种事情，他马上就妥协了。实际上是向林彪妥协，向军方妥协。

林彪看到毛妥协的这一面，但是也许他没想到，毛会处心积虑地报复。林彪、邓小平虽然对毛都有相当的认识，但是他们确实没想到，毛就是在自己看起来没什么力量的时候，也还有那么大的力量。邓小平当时敢于在毛面前叫板（指1975年邓复出后搞整顿），他以为林彪死了，江青这些人有勇无谋，用不上，而且民怨太大，你不用我用谁？他居然在毛面前数落江青。他是不是看出毛在忍，我认为他这么聪明的人，肯定看出来。但是认为你能奈何我什么？林彪当时也是这样，一呼百应，90%以上的，甚至95%以上的中央委员全跟着他，你（指毛）还能怎么样？于是就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错误地估计了毛的垂死挣扎的力量。结果毛两下子就把他们搞下去了。1975年邓小平大搞“整顿”，我看他脑瓜子发热了，他到毛面前告江青的状，说她批经验主义，——毛显然不以为然：“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后来邓隐去“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这两句话，然后把毛这段话说成是毛要解决江青的遗嘱，真是骗人的鬼话！“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这是毛所强调的，已带有指责的意味。是这段话的关键词，不知邓是真听不出还是假听不出！接着说“但有问题要讲明白”，强调的是“讲明白”。之后连续讲“上半年解决不了，……”显然不是讲要“解决”江青或江青问题，而是接上句的“问题要讲明白”。而且说到“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说明在毛看来，并不是要急于解决的问题，或者根本不算是什么问题。这段话，后来被华国锋、被邓小平、被官史所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毛已经在讲《水浒》（宋江是投降派）的时候，邓小平还装作听不懂。我们一听（笑），就明白了，什么架空晁盖，什么投降派？结果邓小平甚至插手文艺界，还不过瘾，还要插手两校（北大和清华）。两校是江青都管不了的，那是毛直接控制的。邓小平在那段（时间）很“猖狂”啊（笑）。最后毛两下子把他打成右倾翻案风。

毛看清楚，江青很难成事，但是他也看清楚，江青是巴心巴肝跟着他走，给他打先锋的。“谁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我”，这一点他毫不含糊。陶铸对江青不

以为然，倒了。林彪压制江青，江青说，九大什么工作都没安排。这些不能让毛说话，毛不好（自己替江青）说话。你林彪都不（为江青）说话，那就很明显了。加上当时黄吴李邱认为革委会的几个层次的第一把手都是我们军队的，我们几个都进了政治局（笑）。

戴：中央文革小组那时候已经要散摊子的样子了。

郑：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就没有了嘛。不能不承认毛是很厉害的，在快死的时候，还是把两大心患——林彪和周恩来先后折腾死了；然后又把邓小平折腾下去（笑）。

戴：所以前些日子，资中筠有篇文章，谈到如果重回文革不大可能，但是重回1957年反右的那个形势还是有可能的。

郑：这不是可能不可能重回反右那种局面，毛死了以后，不是一直都没有停止反右吗！

戴：您是这么看，我又想起我父亲，他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被共产党的领导人欺骗的这么一个过程。

郑：说好听些叫“失败的实验”。其实文革可以算是人类二十世纪的几大灾难之一。一是斯大林的肃反，一是希特勒的灭犹，一是毛泽东的文革。

戴：那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呢？

郑：这有国内的原因和国际的原因。

在国内，由于建政十七年来矛盾的积累，虽经毛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矛盾愈演愈烈，“阶级敌人”越斗越多，而且这种矛盾斗争在党的上层也有反映，毛称之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日益激化。发动文革，正是毛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继续，是毛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共产主义专制体制的必然。

从国际上说，二十世纪50—6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政治、人权、民生每况愈下，东西方差距愈拉愈大，人民对共产党的政府和体制的不满程度日益加剧，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在互相倾轧争斗，甚至武装冲突。苏联和东欧许多国家被迫放宽政策，实行改革，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毛泽东对于这种历史趋势却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方针。他不仅把苏东改革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策略改变，通统称之为“修正主义”，而且进而打起反对帝修反的大旗，与天下为敌，与

人类为敌，甚至在国内也要搞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所以毛发动文革，正是他对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强烈反应的结果。

戴：许多人都认为毛发动文革没有理念，您是不是认为这就是毛发动文革的理念？

郑：是的，反修防修，捍卫马列主义恰是他的理念。毛是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是没有见解、没有思想、没有理念！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有理念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理念是错的，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而他们个人品质的恶劣，心性的歹毒，会使他们错误的理念在实践中贻害更大，造成更恶劣的后果。

戴：那您是不是主张要彻底否定文革？

郑：当然！我知道不少朋友是反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我想问题应在于在什么意义上去彻底否定文革的。

戴：彻底否定文革本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吧？

郑：是的。但邓对文革的否定根本谈不上彻底。他甚至在《历史决议》中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还是好的，只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后来觉得不够，又加上康生和谢富治（笑）。邓的“彻底”，是冲着下面来的，他要彻底否定的是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是要维护一党专政下的官僚体制。他毫不讳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宪法，取消“四大”。

戴：那么，在您看来，要怎么彻底否定文革？

郑：在我看来，不仅仅要否定充斥在文革中许多最落后、最愚昧、最野蛮的观念和行为，正视它祸国殃民，祸乱世界的恶果，更主要的是要从根子上否定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和目的，否定他发动文革的思想、理念和动机，认识它逆历史潮流的反动。甚至需要从实践检验标准上，清理共产主义理论、运动和体制（制度），认清共产主义道路无法通行的原因，从而坚决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改弦易辙，步入人类文明大道。

戴：怎么步入人类文明大道？

郑：就是要建立民主宪政体制，要用人类的普世价值，即人类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所认识到的社会生态原则，来代替邓小平所谓准确完整和基本原则。

戴：那什么是人类社会生态原则？

郑：这生态原则也是四项基本原则（笑）：

一是主权原则——主权在民；

二是人权原则——拥有生命、健康、财产和自由的权利；

三是法治原则——不能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一党专政当然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四是制衡原则——使国家的立法、行政、监督等权力机构形成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有机体。同时要使社会保持自治，强化对国家监督的功能，不再成为党国的附庸。这是保障前三者功能不被冲击和异化的原则。

这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当代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不是讲一般意义上的人性，而主要是讲这四项原则。这个是人民的认识。按照这个认识，所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实践派、民主派主张全面改革。而邓小平的认识不同，他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毛泽东思想。所以他只搞一条腿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官、民的）区别就这这里。邓小平整天想着红卫兵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所以一听到学生游行，就怕得不行。文革的过程肯定是非常荒唐的，但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大民主，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这不等于大民主就是错的。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没什么不好。如果是一种民主体制，有什么不好？邓小平把（文革的问题）都归结为群众的大民主，所以他就惧怕民众的大民主。本来工人罢工、学生游行，这都是宪法保障的民主行为，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够保障这样一种自由，这是民主政体能够允许的一种现象。而且这种游行、学潮恰恰是一种群众诉求的方式，属于民主范围的东西。所以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根本区别在于，胡耀邦能容忍承认这种民主现象，而邓小平要镇压。在民主的试金石面前，就表现出一个人究竟是专制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

我们很多人站在邓小平立场上总结文化革命的教训，就是《建国以来若干历史决议》的立场。这完全是站在专制主义立场上去总结历史的教训，是不可取的。我为什么要专门揭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我这个观点，是可以自我肯定的。■

【访谈】

冷卫口述（三）：读书会

戴为伟 采访撰写

时间：2013年10月3日上午

地点：北京宣武区冷卫家

受访人：冷卫

主访人：戴为伟

记录方式：录音及笔记

到了1971年国庆节前，忽然所有人（干部）看到我们都不再盯着我们了。（我们）一看就是有事了。我们都在想：怎么了？又要有什么新运动要搞到公社来了？

运动是一拨一拨往下拱的。过了国庆节，有知青从省城回来了：“中央出大事了，我也不知道出什么大事了，只知道出大事了。”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有少数自己会装收音机的知青，偷听台湾广播，或者莫斯科广播电台，回来讲：“林彪死啦！”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详情，只是感到是很大的事。过了国庆，我们那里的知青大概走了一半。我觉得走的这些人，大概是秋收过后，要回家去吃大户了。平时也走，但这一次走的人特多。我估计多半人是要回城打听，到底怎么回事！我也跑回贵阳去，碰到一个同学。其实他的父亲只是省工会的一个处长，好歹也算是干部了，听了中央文件传达，回来讲：“林彪想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驾着飞机往苏修跑，中间（途）摔死了。”我们（同学）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下乡不久开的九大。公社宣传九大精神，读报纸讲解，肯定是知青的事。我们都在（各自）寨子里，队长领导学习，主讲是我们这些人。九大怎么回事，文革怎么回事（都是我们讲）。你放给农民讲，他们马上就会说：“粮食关那年，我家饿死3个……”。所以不能让他们讲话，被要求“你们（知青）得不停地说，不让他们（农民）讲话。”

我们刚刚才讲过“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结果）一下子就颠倒了，我们自己都转不过弯来。父亲是工会处长的同学李双碧，他比我们大一岁，他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曾经在一个村子里开会被鬼子堵上，全部人都被抓走了，在县城里关了大约半个月，县里调到地下党的力量，保着他们跑了。这个同学的父亲当时是县里锄奸部的部长，身份如果暴露，必死无疑。所以县里调3个地下党，死了3个人，把他给保出来。但从此，大概是1941年开始，一直审查他，直到他去世。每有运动，就要他交代：叛变了没有？交代叛徒嫌疑、特务嫌疑、汉奸嫌疑。这样，他从北京的司法部，被贬到贵州六盘水的矿区，全家都被赶下去。我们这个同学，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跟着下面一个学期（重新）读。之后，转了三四个地方，才转到省城来。这样的同学，在我们这里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我觉得后来的“读书会”里，全都是这种，人人带着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像我们班这个战斗队，大家都有疑问，但是要去找出答案的人，很少。（在这个环境里）我就不太能够跟其他人交流了。下乡后，文革中有那种所谓的毛主席文件汇编，如《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大的16开本油印的书，比《毛选》四卷的内容多。一开始我们就读这个，还是以前的老思想，用读毛著来解决思想问题。后来慢慢发现，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文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发动的，很多问题，包括农村生活，我都想不通。说“农村广阔天地”，到了底下说“大有作为”，现实问题和理论不同统一了，毛主席语录和很多著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了。我当时的思路，不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吗，想想，这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嘛。我们就要看看马列主义能不能解决。看过列宁，不太能解决；看过马克思，也同样。但是（又感到）它们都能部分地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没有人能讨论、切磋，一个人完全就是在黑暗里瞎摸索。

我们那个区，去了200多学生。李双碧班的也是4个男生在一起（一个寨子），以他为首，我认为我们那个区最典型的一个读书会。他们班的4个人，同时在那里读“马恩”。他们组里有两个干部子弟，一个同学能搞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我们以前总在《九评》里看到这么说，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此后，知青普遍地不安于寨，到农闲或者不回家（返城），大家就走村串寨，到处乱跑。那

时候，所有知青酝酿，要换一个点（落户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人拿到省知青办的什么文件：一个知青一年要缺1/3的口粮，不符合安置条件（插队的地方要保证知青的正常生活）。我们看了文件，理直气壮：这得回去闹，换一个好地方。都想换到距家近一点，交通不紧张的地方。大家就开始走村串寨。我也很积极地去串联。

李双碧文革时是我们学校红代会的主任，后来成立的校革委（会），他又是校革委的主任。当时我们觉得，你是我们学生的头，有事就得你们出面。他自己也觉得，我是得为同学们说话，毕竟当年他也鼓动我们下乡嘛，他觉得有责任挽回点。这样，我跟他们接触深了，才发现，怎么你们几个同学枕头边不约而同都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你们怎么看这些书？他们也觉得奇怪：“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大家由这里就开始沟通了。这样才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想解决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李双碧说：“那你以后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嘛。”

后来，我们劳动、农忙时就算计着，出工满100天，可以分到300斤毛粮，这份毛粮可以不用交钱了。毛粮很便宜，在队里折算时，一斤毛粮大概1毛多钱。我只要做满100天（工），就不用跟家里要钱，到队里买毛粮了。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出工100天；（一年）剩余的200多天，就不像原来，全部都出工了。这是（下乡）第二年的事，第一年我老老实实干，第二年我就不（那么）干了。干满100天，跑到李双碧他们那里呆几天。去那里，不好意思总吃别人的定量，就自己背粮食去。他们最欢迎我们的白薯，他们那个地方大米多，我们就做“二米”饭，玉米和白米煮在一起。这对我们就很了不得了，（因为）我们每年是6个月的苞谷饭，1个月的小米，1个月的白薯，根本没有白米饭。他们想吃我们的小米和白薯。我们就扛上一袋子（红薯或玉米）到那里，大家挤着住上两三天，大家交换看的书，也讨论。这样读书会算是正式在那个知青队里形成。我们200多知青中，大概有三四个读书会。

有人喜欢文学，算一种；有人喜欢艺术——吹拉弹唱，大家聚在一块，切磋技艺。我参加的李双碧这组，号称是学习文史哲，但是文学少，因为没书看。也有些《中国文学史》，北大几级编的那种，《欧洲文学史》等；或者更老的，

李煜（愚？音）的文学书；或者《文心雕龙》，看也看不懂，也在同学中传来传去的。

但更多的，我现在认为，是以社会政治、思想理论为主的那么一个读书会（小组）。这个读书会对我吸引力很大。

戴：这个读书会有多少人？

冷：在农村时，这个读书会有七八个人。回到贵阳后，因为我们要在贵阳住2个月（每年），后来越住越长，住3个月，甚至住4个月才回去（下乡），这个时候，经常去他（李双碧）家里的，有13、14个人。我这个同学（的居住）条件得天独厚，他父亲是很老资格的处长，工会分的房子比较多。我这个同学读到高二，他一个人有一间房。要是工人家庭，这一间房，可能挤下一家三代，肯定不可能做读书会的场所。他有这个条件，大家都跑他那里去，每次都聊到很晚。当然，也不仅是聊社会问题，什么都聊。又一次聊到夜里一二点，肚子饿了，但是那时候家家都没有（多余的）东西吃，坐在那里开始胡说八道。有一个同学感慨道：“我们这些同学也都是老实正派的男生，怎么都没有女朋友呢？老实正派的女生都在哪儿呢？”我就开玩笑地说：“（可能）那些女生正在讲，老实正派的男生在哪儿呢？”还有一次聊到夜里两三点钟走出来，外面一片漆黑。那个时代，夜里一走出有灯光的房间，外面几乎就是一片漆黑。一个同学感慨说：“刚才还讲得一片光明，走出来一看，无产阶级专政依然这么巩固！”大家哄堂大笑。

这样讨论了一些日子，大家就有了一些共识。第一个大共识：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是两回事；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马克思主义和另外一些，比如洛克、苏格兰学派等等，就是鼓吹民主主义的人，甚至和法国启蒙学派也是两回事。这些讨论都会很多。还有，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按照马恩的前提，虽然有阶级之分，但是一直讲的是多数人过好了，少数人过得不好，这才是社会主义的优势嘛。什么叫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含义）是大家都过好，马恩认为不可能，有阶级，那么就得说无产阶级过好（生活），资产阶级过得不好，多数人（生活）好，少数人不好。但是中国的现实是，很明显，多数人过得不好，首先农民是占绝大多数的。我们看见了，他们过得极其不好，谁都不愿意当农民，连我们这帮人（已经下乡落户的知青）都不愿再当农民，更别说让那些干部下来，他们就更不愿意了。这就（使我们）看到这个现实，中国

这个不能叫社会主义。但到底叫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也有说，封建主义，也有看得特别透彻的；比较极端的人也会讲：“现在，借用《九评》里的词，（应该）叫‘社会法西斯主义’”。但是大家有一个共识，认为从学术理论上讲，不能讲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多数人过得不好，怎么能是社会主义呢？

看到列宁《国家与革命》里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条件的，首先要有强大的工人阶级。马恩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英法这样的国家爆发。德国的条件很特殊了，工人阶级的人数很少，但是德国有许多其他的优越条件。马克思讲过，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德国先爆发。然后，列宁讲，俄国的条件比德国更差，但是俄国又有这样那样的条件，比如说广大农民深受压迫，沙皇统治既残暴又腐朽，容易推翻，所以革命不在德国出现；德国的工人阶级还被收买了，农民也不如俄国农民苦，所以没有人作为革命力量。俄国有这么多特殊条件，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俄国先爆发。《国家与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写的，列宁就板上钉钉地讲，就应该在俄国这样的地方爆发；但是下面又有一个补充讲，俄国是一个格外的例外，如果社会条件不如俄国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没有无产阶级，所以从革命史上来讲，以前讲，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不对呀，上井冈山的都是农民呀。秋收暴动等，看到红军的老将领，批判的也好，回忆的也好，有哪个不是农民？又有几个是工人？没有。党的领袖里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工人出身的人。所以大家认为，这些都跟现实宣传中的不一样。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作用。工人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下乡之前也去过工厂，搞大串联的时候，跟工人在一块。最后等到要清算的时候，主义兵要清算，工厂里的各种造反组织也要清算。工人了不起了，还是开您的车床；个别的头目，到党办的这些人，被贬到五七干校去，也是干农活，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时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起什么作用。

从1921年建党，一直到1969年，我们上山下乡，所谓等到文革走上正轨，没有看见无产阶级起作用。当时我们这些思想可以说很反叛，我们自己也觉得把理论上的这些疑问都统一了。但这个统一的结果，按正面教育来讲，却都是负面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根本不能叫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本身就没有，所以（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这几十年根本没起过作用；革命中起作用的就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马恩对农民的理论分析，大家一翻就可以看得见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讲法国农民，直接说，法国农民是一切反动势力的基础，他们先天地就会支持专政，专制制度的基础就是农民。农村的所有制和农民的意识形态就是专制基础。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很（有）共鸣的。分析文革，没有比《法兰西内战》讲得更好的了。

我们的革命是受苏联影响，不是“以俄为师”嘛，《毛选》一打开就可以看见，“一边倒”。什么：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一边倒。我们小时候都听到过五几年的那些口号，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那一阵，我们也去读苏联的那些党史。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1939年斯大林编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编。到了1956年批判斯大林以后，1958年苏联出了厚厚一大本《苏联共产党历史》。两本对比一看，批判斯大林主义这些东西，总结苏联革命的负面经验等。苏联人总结的这些和我们自己摸索的很相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读书会里很盛行。我手里没有，借来，两天不出工，坐在家里，抄！两天两夜，楞把报告抄了一份。

同屋的一个同学也很感兴趣，他不是读书会的人：“还有这样的东西，我看看！”看了后讲：“我回家带给我爸妈看。”我也不好阻拦。（但他）回来跟我讲：“没有啦。”

“怎么啦？！”（咬牙问）

“我爸回去一看，这么反动的东西，这不是惹祸吗？给我烧了。”

气死我了！我说：“怎么能把我的东西烧了？又不是你们家的东西？！”但已经烧了，我能怎么办呢？！我重新再去读书会，再把那个“报告”借回来，又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抄了第二份。当时这种信息还是很少的。读书会里我觉得最缺的还是信息。

我们这个读书会和贵阳其它一些读书会还有一些交流。但交流得很谨慎：谁都知道，一出事就是反革命小集团。有些书传来传去，我就看不见。在读书会我只是一般成员。刚才说到的李双碧，从外头弄来一本德约拉（的书），现在翻译成“吉拉斯”，（他）写的《新阶级》。这本书在世界共运史上是有名的。它直接讲：共产党革命造成的结果，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是造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可以叫共产党阶级。人家是这么个观念。这本书可是1953年写的呀！

还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前。在整个读书会期间，我都没见到这本书，只是李双碧给我们复述。

戴：后来你看到过这本书？

冷：后来看到了。我一直到了15年前（1998年），我才从网上找到电子版的这本书。当年是把它印成灰皮书，我听说得是什么厅局长级的干部才有资格拿到这样的书看。读书会的这些人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秘密报告”据说是处级干部家里就有，我们可以借来抄；像这种《新阶级》，直到15年前，我才看见。

读书会这个现象，至少在贵阳，我知道的比较活跃的读书会，其实也就是一些前红卫兵（时期）残存（下来）的一些小团体。我知道的（当时）比较活跃的小团体，在贵阳应该有三四个。当时我们沾沾自喜，觉得我们这个小组的学术水平最高，大家经常彻夜辩论。以后，我们走出去，跟别的小组见面，我的感觉是，在贵阳，没有一个小组辩得过我们这边的这些人。我们看的信息资料比他们多，讨论程度更深入，他们不敢说的话我们敢说；或者他们比我们大胆，但是论证过程中，理性（思考）不如我们。我觉得很得意。这时，自然就有一个想法——到更广阔的天地去。

李双碧有一个好朋友，他们两家是世交，两家的父亲都是那种三七、三八式（干部）。当年在山西，日本侵略时，参加革命。这个朋友姓韩，我们叫他韩军（化名）。韩军在哈军工的时候，成绩很好。他只比我大一岁，跟李双碧同年，1947年出生。在哈军工的时候，属于那种思想很敏锐，自己也读了一些社科理论方面的书。在文革期间，哈军工有份著名的报纸《红色造反报》，他是这份报纸的主笔、主要的编辑之一。临到毕业的时候，清算造反派，他差点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最后还好，没有被带上帽子。但分配的时候，分到贵州。三线建设条件不好，被分到一个航空工厂。工厂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老家在山西，每次回去上火车，要在贵阳上车，回来就住在李双碧那里。他思想比我们敏锐，信息比我们多，思考问题比我们早。他一进读书会就成为我们的导师之一，我们讨论、争论不出结果的东西，提给他，他总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能够启发我们另开思路。我们读书会里几个比较核心的、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有大约7个人，大家不约而同地将韩军看成我们的思想导师。

他后来结婚，夫人在株州一个大飞机厂工作。株洲的条件比贵州山沟里好，他结婚后调到株州去了。我们在贵阳不了解情况，想着：哈军工那些学生，什么能人都有，也在找出路。通过他，我们才知道，作为一代红卫兵，有这种疑问的，是相当一部分人。我们很想通过他，走向全国。我们7个人商量后，决定要跟韩军联络，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更多的联络的网络。（大家）推（举）李双碧和我，两个人跑到株州去。那时候是1976年8月，热得要死。

戴：读书会持续到这时，已经有四五年了。

冷：哎。从我1970年到李双碧那里，到这时已经6年了。这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再过一个半月，文革就要正式结束了。（笑）（同学）送我们两个人走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李双碧瞒着他家里走的。我们这7个人开会的时候说，如果我们两个在外面被抓了怎么办？这时我们就约好，（如果）公安审问，完全不说是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说，肯定是害人的。最后7个人商量，问起来怎么说呢？最后我们编了一大堆鬼话……当时想得很简单，自己觉得这样已经能蒙混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想的这些东西很小儿科。公安整天对付这些人，你怎么能骗过他们呢？但当时想得还是很简单的，也没有很明确的想法——找到韩军，我们要干嘛，都没有想。只是说，他调到株州去，我们已经两年没见面了，情感上很想念他。二是，这两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进步，也有更多的疑问，希望他来解答。第三个问题才是说，他跟全国各地有什么联系，跟他讲讲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没有？（笑）

到了株州以后，韩军完全是回到业务工作里去了。他原来学的是俄语，现在要掌握各种资料，要学英语；他的夫人要学法语，准备要生孩子；他夫人家在广州，想把他们调到广州去……一大堆种种这些事情。已经不像在贵阳，我们在一起纯粹讨论学术思想，已经没有了。最后，我们问他，你在交什么新朋友？他把他的新朋友领过来，——到现在，（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圈中最好的人：有一对夫妻出国了；还有一个朋友，现在也在广州；韩军夫妻俩都在广州。这就是我在广州的朋友圈子了。

但当时见面聊了以后，李双碧和我都大失所望：我们取得的进步，韩军表示很高兴；我们的疑问，（虽然）他还是解答，但我们感觉锐气已经不像在贵阳了。剩下在一起吃饭，晚上挤在他们那个小屋里，他们夫妻俩睡在床上，我和李双碧

睡在地上。热得要死，半夜睡不着，开着门聊闲天。他们开始讲生活问题还是很多啦。我和李双碧就觉得：啊？怎么也食人间烟火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结果在他那里住了半个月。韩军当时在通读鲁迅全集，他更大的兴趣是跟我们聊鲁迅。但我们不想聊这些，我们老想聊什么——江青这一伙人什么时候能够垮台；文革已经走不下去了，到了这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们老想聊这些现实的、切身的社会政治问题。

其实，现在回想，他当时有些想法实际上是更深刻了。研究鲁迅实际上是由政治问题，进入到（探究）文化原因，实际上是更深层的研究。这是我过了好几年才悟到的。但当时没想到这么细。在韩军很热衷讲鲁迅的时候，我和李双碧很失望，灰溜溜地返回了贵州。

没想到，回贵阳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去世了，紧接着粉碎四人帮，文革就结束了。这时，我们读书会的人最后一次开会。那时还是很幼稚的，一个读书会的哥们儿讲：“好啦，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可以大有作为了！我们的个人前途都有了”。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四人帮闹了这么多年的倒行逆施，现在要拨乱反正，不得有人重新来宣传？现在谁有我们这些人了解马列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党不得借助我们这些人来宣传？马列主义，中国有苏联的前车之鉴，中国必定要走赫鲁晓夫的道路。只有改革是出路了，共产党国家只有这一条路，南斯拉夫和苏联都这样做的。中国改革也在眼前，谁来讲改革？”这个朋友很自信：“就是我们！”

你注意他的落点——我们这些人的前途都不是问题了。我们7个人里，有4个人的家庭是中等的——一个革干，3个知识分子家庭，还有3个人是真正城市贫民家庭。说刚才那番话的人，家里穷得很。他的父母亲原来在街上摆小摊，放个箱子给人家修鞋、擦皮鞋。现在理解，不论干什么，他是一定要个人能够出头，摆脱社会底层的环境。

当时我还反驳，说不可能的，你小看共产党了。文革前，共产党有一千多万党员。我说，这一千多万党员，只要还有一半，谁不能说两句这种宣传呢？我说，党只会依靠党内的力量；像我们这些人，思想都不能被党认可，你还想让党给你出路？没可能。

当时我还没想到进一步：个人要想有出路，必须得投合主流思想，才能够像他想的那样有出路。结果就是他（希望）的结果，后来他在贵阳混得很不错了，混成一个贵阳市的中层官员。当然，以后（这些人）的锐气都没有了。

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大分化就在眼前，都沉浸在“好啦，江青一伙垮台啦！毛的这一套所谓文革路线破产啦！中国马上就会面临改革！”我们都沉浸在这样的欣喜之中，完全没想到我们这些人就会大分化，以后的人生道路会很不相同。

这以后，我想：能干什么？不知道。但是读书会这6年培养起一个兴趣，我一直对这种社会政治理论有兴趣，我会看一些经济学、哲学，一直在关注。最终这些东西对我当然也有实际的好处：比如说文艺理论是离不了哲学的。像那种苏俄的老路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老路子：什么叫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就是一个社会理论，也是讲文学的社会性，这是别、车、杜带来的影响。读这种文史哲，对理解这些文艺理论大有好处。到了1978年我去考大学的时候，文艺理论对我简直就不是问题了；一直到入学两三年，我还跟老师辩论。那时候，还在讲文学的性质，我就一直讲，文学不能讲党性，文学要讲人民性。所谓人民性，我的理解就是别、车、杜那一套。当时在学校里，老师辩不过我，觉得这个学生很刺头，但是又觉得我讲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时我自己就增加了很多自信感。大概（读书会的）最后这些好处，对于我，就是落到这些上面。我在大学里，文艺理论对我一直不是很大的困难，我也不用特别用功，老师指定的那些书，90%我都看过了，这样我基本可以扩充读一些别的东西。读书会让我终身受益。■

【随笔】

滑溜溜的委婉

——“红色话语”小议之二

启之

“九一三”以后，久不见林彪露面的外国记者在北京的胡同里瞎转，想从市民的嘴里套出点消息来。碰到一群疯玩的孩子：“你们的林副统帅到哪里去了，怎么不出来了？”孩子们拍着屁股嚷嚷：“格儿屁着凉大海棠了！”老外恍然大悟：噢，林彪病了，肠炎（打咯放屁）加感冒（着凉）。可为什么“大海棠”呢？老外回去查词典。

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段子，它说明一个问题，有些委婉语像泥鳅一样滑溜溜，你弄不清它是什么意思。

就拿“光荣”来说吧。这个词有时候意思明确——“班长，要是我光荣了，就把我的入党申请书交给指导员。”这是红色文艺中常见的表达。此处的“光荣”来自于“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的理念，以形容词“光荣”来承担名词“牺牲”的意思，为战死沙场的惨烈戴上一顶荣誉之冠。

另一种“光荣”的意思就滑溜溜得难以把握了。一位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告诉我，在1942年的抢救运动中，他的一个同学在逼供下乱咬，说他是蓝衣社（国民党特务组织之一）。大家逼他承认，他不认。女友动员他：“谁坦白谁光荣，你坦白了，咱俩还是朋友。”他反问：“说假话能光荣吗？这种光荣我不要！”结果女友离他而去，嫁给了一个大首长。为了让他早日“光荣”，班长决定发动“车轮大战”——七个人分成三个小组，不舍昼夜地对他进行威胁利诱式的启发教育，熬到第四天，他顶不住了，在迷迷糊糊之中，承认了蓝衣社。

一个月以后，在王家坪的桃园举行坦白大会，叶剑英主持，号召失足者快点坦白。主席台两边设有“光荣席”，桌上摆着香烟茶水。他被同志们连拉带拽弄到了“光荣席”上。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一想起来那份“光荣”还浑身冒汗。

何方在他的书里也提到了这个坦白大会，提到了主席台两边的“光荣席”，书里说：“一坦白，就算‘光荣’了，还可以抽一支烟。”——要知道，那时的延安，香烟是最难得的奢侈品，投奔革命的烟民们缓解烟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开会时坐在主席台前，捡首长们扔的烟屁。尽管如此“‘光荣席’上的香烟吸引力并不大，许多人被积极分子连拖带拉就是不上去。”何方就是其中一个，他老兄搂着一棵桃树，积极分子们说破了天，就是不撒手。“让他们嚷嚷去，嚷嚷完了总得散会。”抱定这个蔫主意，他终于没有获得那份能抽一支烟的“光荣”。

这个“光荣”给语言学出了一道难题，它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解释它？按上述语境，它应该是“坦白交代”的委婉语。麻烦的是，那坦白交代是假的。如果真的坦白交代算做光荣的话，那么假的坦白交代只能归为耻辱。这种“以耻为荣”的语言现象说明了什么？

“帮助”也有点滑溜溜。何方把它解释成“围攻”——“由领导给分工，找几个积极分子，再搭配几个普通学员，去围攻（名义上的帮助）一个重点，日夜鏖战，直到被围攻者‘坦白交代’。”这种释义虽然形象生动，但有些含混。是否可以这样解释：在政治运动中，为了促使某些人达到掌权者的要求，有组织地对其进行说服动员，以至刑讯逼供的做法。

“帮助”大体上可以分成冷、热两种。冷帮助主要用语言从精神、心理上给被帮助者以威胁恫吓。通县河北梆子剧团的舞美设计江皓先生，曾这样记述团里的造反派“重点帮助”他的女友刘炜：一武生主演声嘶力竭地痛斥贫农出身的刘炜忘了本，背叛了她的红色家庭，竟和一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搞对象，丢尽了革命家庭的脸。

“热帮助”不但用语言，还要用暴力，用伤害被帮助者的肉体来达到目的。“挖肃运动”时期，土默特右旗“群专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常常这样威胁“内人党”：“灰烂各抛（坏家伙），肉皮子痒痒子么？要不要爷找人帮助帮助你？”这种帮助的结果，就是皮开肉绽，筋断骨折。

“帽子”这个词，我们常用，但是要把它的意思准确地说出来并不容易。“五子登科”中的“扣帽子”，可以解释成“强加罪名”。毛泽东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也可以说是开“罪名工厂”。可是，“戴帽子”、“摘帽子”中的“帽子”就不好这样理解。比如，你不好把“帽子拿在人民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

改成“罪名拿在人民手里，随时都会给你按上。”如果你认为，“党委决定给张三戴上中右的帽子”可以解释成“党委给张三加上中右的罪名”，那么“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会不容商量地扣在你的头上。

帽子的滑溜溜，与它前面的动词有关，如果“扣”上去，那么帽子就是贬义的；如果戴上去或者摘下来，那么它至少是中性的，像英文翻译的那样，成为标签（name-calling/labelling）的另一种表述。

“因公死亡”大概是滑溜溜之最。字典解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因履行公职遭受事故伤害造成死亡，或者患职业病经医疗救治无效死亡的，称为因公死亡。”文革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有的死因不明，有的虽然死因清楚，但不好明说。怎么办？都归为“因公死亡”。比如，1966年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四十年后，同事们出书，称其为“壮烈牺牲”。而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则称其为“因公死亡”。再如，1970年10月23日，原科委主任，著名记者范长江的遗体在其关押的河南省确山干校的一个农村的机井里发现。如果是自杀，水性好的范长江不会选择投水；如果是他杀，又找不到凶手。于是就来个“因公死亡”。

文革结束后，公安司法部门对秦城监狱的看守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那些用法西斯手段折磨犯人的酷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据说有17人被秘密处决，而其家属得到的是“因公死亡”的通知。

这里的“公”耐人寻味。上例似乎提示我们，是指国家干部、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政治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比如，批斗与挨斗、游街与被游街、施暴与被施暴、看牛棚与关牛棚、搞专案与被审查，都是履行公职。所以，如果在这中间出现了死伤——不管打人的还是被打的，都应该归为因公。换言之，张霖之、老舍、卞仲耘、孙维世、傅连璋、郑君里、张志新等成千上万死难者，都是因公死亡。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四人帮”抓起来之后，有一次，北京大学批斗迟群、谢静宜，聂元梓和蒯大富被拉来陪斗。聂、蒯愤愤不平：岂有此理！迟群、谢静宜把我们关了十年。我们怎么跟他们一起挨斗！如果他们知道“因公死亡”的兼容并包，就会好受得多。

很少有哪个委婉语像“因公死亡”一样的大肚能容。一般的委婉语只是把坏事说成好事，至少是不那么难听——国民党把“逃亡”叫做“撤退”或“不守”，大陆管“三年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日本管“经济萧条”叫做“经济调整”，美国人给穷国留面子，称其为“发展中国家”……

委婉语这种滑溜溜的品性，甚至足以让人丢掉性命。民主柬埔寨时期，有一个不祥的词——“sneur，意为‘邀请’或‘询问’……红色高棉会来某人家中，sneur（请）某人的儿子去学习或去受教育。很多人被这种礼貌的要求所迷惑，完全没有反抗。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那些被请去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带走杀死’。”

无独有偶，饶瑞农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沉痛的故事：他解除劳教后，不能自谋职业，只能“留厂就业”。“所谓‘留厂就业’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与另一种直言不讳的说法‘留厂继续改造’交替并用——需要你‘安心留厂’时用前者，需要你‘服从管教’时用后者。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业’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人的‘法定名称’叫‘厂员’而不是‘职工’，相互不能称‘同志’而只能叫‘同厂’。尽管从法律上讲我们都已恢复了公民权，但与同厂犯人的区别也就是不剃光头、不住监房、有工资，‘理论上’还能请假外出而已。”

不幸的是，他的同厂许小彦，一个二十多岁的刨床工，把“留厂就业”这表面的堂皇当了真，以为自己既然从法律上恢复了公民权，就可以真正享有之。在批林批孔期间的“某个休息日，因家有急事又怕不能准假，便毅然以‘公民身份’擅自离厂，结果被以‘逃跑’罪名抓回、手铐脚镣投入禁闭室内。一日，厂部最高领导王政委亲临禁闭室对其进行当面教育，话不投机还被带镣踢了一脚——这‘身份僭越’的一脚，其代价就是‘厂员公民’许小彦不久后以‘呼喊反动口号’为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在全厂大会上当场点名、当场宣判、当场执行。”

有了这些滑溜溜的委婉语，就会有滑溜溜的委婉文。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某班主任“经过了反右之后，对缺点和问题就不再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而是采用了迂回曲折的暗示方法，即反面文章正面做。如有的同学性格孤傲，脱离群众，作为鉴定语言，则写成‘希望能广泛联系群众’。有的同学骄傲自大，刚愎自用，在鉴定中则写成‘希望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有的同学婚前与异性发

生了性关系，这在当时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在班会上对这位同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在鉴定中则写成：‘希望在生活作风上加强自我修养。’这类含混不清的语言，使人读了不知所云。据说，用人单位曾派一干事到北大中文系，专门询问鉴定关于‘在生活作风上加强自我修养’一语，是否指该生曾犯有偷窃罪。”这位慈悲为怀的班主任，为中国委婉语的发展繁荣增添了悲枪的一笔。

综合以上诸例，似可略做小结：委婉语是社会禁忌和文化避讳的产物，它们大都跟政治有关。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谁管理呢？古人说是圣人。圣人怎么管理呢？钱钟书引《诗经》、《老子》、《韩非子》、《庄子》，以及古人的注疏，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圣人代表着上天，其管理之法遵循着“道”。这个道取阴弃阳，“无声无臭”，“在隐在匿”，“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不知其主，出乎幽冥”。古人也觉得这么说过于抽象，于是用三种东西做比喻：一种是小偷，一种是老鼠，一种是鬼。小偷作案前后要隐匿，作案时要身手灵活，速战速决（“静如鼠子，动若偷儿”）。老鼠藏匿于洞穴之中，出来觅食悄无声息（“如鼠藏穴，潜隐习教”）。鬼呢，夜里才出来，阴险诡秘，不可测度。（“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阴密’”）（《管锥编增订》第一篇，1982年9月第一版）你想想，如此高深莫测的东西，能用寻常的语言表达吗？■

2014-11-16 日修订

【述 往】

插队的那些事（九）

——小营子的“反革命”

朱 特

大约是我们知青到小营子两个来月的时候，已经到了早晚需穿厚衣服了。那天下午上工的时候起了风，风把地上的细砂土卷了起来直往人的眼睛里钻。天上还有点薄云，阳光经过云层的遮挡不像往常那样晃眼了。还没走到小营子队部前的上工集合点，我就看到已经有了一群人在那里。从远处看似乎和平常不太一样，人们聚在一起好像在开会。走近了才看到一个年纪比我大几岁的年轻人站在一块石头上讲着什么，一只手里托着一尊毛主席瓷雕像，另一只手里握着一卷纸。等着出工的社员们就围在他身旁听他讲话。

那时我们到雨村时间还不长，听老乡们讲当地方言还挺困难。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讲的是是什么，只是看到听他讲话的人神情都是怪怪的，好像想笑又不敢的样子。我们知青到小营子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年龄仿佛的后生家差不多都认识了，这个在人群中演讲的后生却是头一次见。只见这个小伙脸色惨白，这种白是长时间没有被阳光照晒造成的；在京城里我见过刚从局子里出来的小兄弟，就是这样一张惨白的脸。这个小伙穿着一身黑袄裤，衬托着那张脸愈发显得白。

我正使劲想听他讲些什么的时候他却不讲了，只见他把手里的那尊瓷雕像向空中高高举起然后狠狠地摔到一块大石头上。他的这一举动惊起一阵喊叫，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他摔的可是被全国人民称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哟。天呀，这不是现行反革命还能是什么？面对这样明目张胆地对伟大领袖大不敬的现行反革命，我一时没了方寸，发起愣来（由此可见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个后生摔完瓷像后又把另一只手里的纸张分给众人，他见到发愣的我，说，你是知青吧，给你一张。说着把一张大纸塞到我的手里。这时上来几个男人连拉带拽把小伙子弄走了。

那个后生给我的“传单”原来是张年画，在红红绿绿的年画后面写着如同诗歌那样排行的文字。我看了一下内容，既让我心惊肉跳又叫我哭笑不得。让我心惊肉跳的是那里面有许多支持赞扬刘少奇、彭德怀的内容，更多的是说毛泽东不是东西的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非毛”语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把玉皇大帝、孙悟空、太上老君等一干神话中的人物和当时最好与最坏的人都混搭在一起，让我感到写这些文字的人精神上有了毛病。

果然，老乡的话证实了我的判断。

这个年轻人名叫在在，二十三岁。前两年在城里师范上学时处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不知为甚，女朋友和他分了手。这事对小伙子是个沉重的打击，一来二去情迷心窍的在在就“闹上了神经”，又加上文革兴起，那学自然也就上不成了。回到家里的在在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一发起病来如同孙悟空大闹天宫一般。家里人没有办法，只好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不让他出门。所以我到小营子两个来月从未见过他，也没有听说有这么个后生。今天家里人稍一疏忽，让他跑了出来闹了这么一出。

听老乡一说我也就释然，原来是个武疯子。可他的举动还是让我不解，他的疯言疯语都是和这个社会的调调相悖呢。但一想到是个疯子也就不再多想了。转眼冬天到了，知青们都回北京猫冬了。转眼又春暖花开，我回到小营子“上班”。回来后得知那个叫在在的武疯子被公安局“抬”走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原来那天在在于小队部前的折腾被大营子的一个小后生看到了，回到大营子不免演说一通，一传十，十传百。说来凑巧，旗公安局刚刚解除“走资派”罪名的前局长此时正在大营子蹲点，他听到后认为此案不抓还抓什么。“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戴在在在的头上正合适。这事我只当是雨村新闻，听听也就过去了。这年头“现反分子”多如牛毛，在在摔雕像说来名至实归，虽然是个武疯子抓就抓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没想到的是过了没有多久，前公安局长来到小营子找知青们开会，让知青们写旁证；一是知青们都看到了在在的言行，再就是知青们全都有文化。这是义不容辞的事，知青们把那天看到的事都写在了纸上。

我拿给前公安局长看时，他让我把凡有涂改的地方都摁上手印。我随口问了一句那个在在关在了哪儿？前局长告诉我说关在集宁的监狱里。出自好奇，我又

问了问那个我只见过一面的年轻人的情况。他说，呀，这个家伙可是个死硬货哩。那次我们去狱里调查情况，看见了这个家伙的脚踝骨都被脚镣磨出了骨头还不咋地，向我要布垫上，我给他找了点旧衣服扯下来的布，他拿过去就垫在脚镣上。我们是想问他有没有指使他的人，有没有同伙。这家伙说，你不要问啦，有我一个就全挡住啦。你说这家伙……前局长的口气似乎很看重在在的骨气。

夏天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要枪毙在在，枪毙之前还要开全盟（乌兰察布盟）的公审大会。枪毙反革命分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常见事。我是在在案的目击者，还写了旁证，感觉是木然的。我只记得开公审大会的那天，在在的母亲独自坐在小营子村南头的大喇叭下听大会的现场直播。远远的，我听到喇叭传来杂乱的口号声，还看到老人不时扬手向天，似乎是在哭号。那时我心中一软。

多少年后听说在在平反了。政府对家属的补偿是安排其弟脱离农业地吃商品粮，这是当时庄户人梦寐以求的事。

四十多年过去，我突然想在在也许真的不是疯子。■

【述 往】

安希孟回忆（八）

——北师大的同学

安希孟

我们班的同学各有千秋。此文是童言无忌，回忆少年时代衔手指头骑竹马的经历，如果不慎冒犯了那位尊严，也请海涵。王永琴、孔庆美汉语言文学功底好，文章书写也好。我这样说，一点儿也不是贬低他们的英语、绘画和游泳、唱歌的意思，当然也不是说别的人中文水平差，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长项。雷恩施天生有行政才干，现在却是业务骨干。刘来牛绘画美术字有功夫。徐秀芬的乒乓球、羽毛球潇洒。张慧芬是津门才女，才貌双全，仪态万方，被发配到关外。我上课爱回答问题，但她，就很矜持。王尔德会吹——不是吹牛，而是吹管乐。教室墙壁上粉红纸毛笔书写的毛主席语录，一定出自他的手笔。袁景龙会吹小号，所以大家就叫他小号 trumpet ——你看他那体形，苗条身段，就是小号！朱其英的小提琴据说是意大利拉法。他的父亲是铁道学院教授，据说和周总理一道干过地下工作。文革中去过他家，墙上挂的他小时候的绘画“跟爸爸散步”（一只喔喔叫的昂首公鸡带领幼稚）——然而父亲无法保护孩子。王崇义、刘泽英歌喉嘹亮。如果有专业指导，应该是歌星。王崇义、王尔德小号，袁景龙是校宣传队的——严格说来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朱其英是校广播站（文化革命改称井冈山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播音员。

晚上学生宿舍楼常有朱其英和张仲卿琴瑟和鸣。陈毅文会拉二胡。我拉二胡就是杀鸡给猴看。胡伢子回南方，好几个人托他买粤琴。张祖荣用墨水瓶盖制造象棋棋子，棋子上的隶书是高水平。刘希贤、吴振明对弈，大家伸长脖子看。刘希贤是天津才子，他可以躺在床上盲棋，文革前被打成反动学生。整他的老师，文革中受到冲击。奇怪的是，受到冲击者，自觉委屈，却依旧觉得刘希贤就是反动学生，是旧党委包庇的，只有他们才政治上可靠，他们才是被冤枉的。刘希贤

后来成了特级教师。安希孟、王尔德，剪刀加浆糊制造手工扑克。王永琴是我入团介绍人，但我入团心切，常越位找常新华（支部组织委员）、雷天生（书记）“汇报思想”。那时活思想也着实多。自己编造一点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自我解剖麻雀。我爸爸四清有点小问题，也抖落给他们。雷天生在文革伊始就预见江青会窜升。大概从杨芝霖、于陆琳（部长夫人）那儿得风气之先。不过很奇怪，他并没有如所期待的附势趋炎攀爬钻营，混入政界弄个官儿当当。

王尔德（永明）和孔老二（庆美）文革中家庭成份忽然从贫下中农升格为富农。我猜想是因了他们考上大学，村队干部因羨生妒（入学教育那阵子有人说贫下中农把他（她）送到村口，我和隗仁莲后来都说自己没这么幸运）。王永明父母文革中除夕夜还得劳动改造拉沙子，夜幕沉沉中，幼弟嗷嗷随父母在野外喝西北风。我虽和他两派，但同情他。他诉说时，我很伤感。孔老二文革回家向大队申诉自家成分改变为富农一事，被大队干部奏了一本，说她为反动家庭翻案，工宣队还拿这事敲打她，在内部小范围会议上通报。我于是知道，旧文化传统，人附着于本乡本土。咱们如今还宣扬乡土意识，怀乡还土，解甲归田，真不可思议。

大学生活回忆中不可磨灭的几个人物有张广慧、刘泽英、徐秀芬、董丽琴、刘来牛、常新华、王尔德、李治伦、陈毅文、吴振明、郑艳芬等。博学的吴振明，苏州才子，智者乐水，令我照见自己浅薄无知。吴振明才气非凡，也是树大招风。他被同班的井冈山战士打成反革命。羡慕嫉妒恨呀。他分明由于才高八斗招来忌恨！我觉得整人者应该知道反思而不是自倒苦水。有一次争论共产主义还有没有货币，吴振明言之凿凿：马克思认为取消货币。我等如听天书莫名所以。当然啦，后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知道商品经济货币经济是资产阶级法权，不平等的根源，亟宜铲除。按需分配当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福山谓之曰历史的终结。这个苏州才子！可是看来将来不会取消货币。

我在北师大的挚友知音陈毅文，忠厚少文可信可交。工宣队进驻后我和他一度是双人舍友。一次我胃疼出荨麻疹持三联单（大概）到北京中医院就诊。他陪我去，还为我买了桔子花生。一九六八年“七·一二”武斗包围工五楼，断水断电断粮，晚上我们在附近楼上值守，监视，防止兵团潜逃。黎明晨光熹微中，忽有两位兵团同学从楼下急遽窜出通风报信求援。那是饥寒交迫中的求生者。陈毅

文看见，并未喊打或投掷砖块，而是悄悄放行。我问他为何不推落窗台上暖气片砸下，他说他不忍心：万一出人命怎么办！由此知他善良人性，民胞物与之心。

我另一好友是李智伦。二人相交，互不介怀。1969年战备疏散演习，防止苏修突袭，学校到“东炼”劳动，我和他到西北楼各腾空之宿舍扫荡检拾废旧书报杂志，卖得十几元。两人下一趟馆子后，李治龙说“剩余钱归你”。我发了一笔小横财。那次还捡到一双旧皮鞋，正合我脚。

那时候还经常晚上突袭查户口，特别是年关将近，“敌特分子”有可能潜回北京“制造混乱”——这当然是说笑话，其实针对的是春节回城探亲的知识青年，彼等居然被当作危险势力。他们如果在大兴安岭，顶多烧死几个人，可北京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必须绝对安全。

我们穷，要出门就得要坐车，要坐车就得买车票，要买票就得有牺牲。在北师大乘22路车，逃票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逃票。安希孟就是这个逃票队伍的一员。在北师大乘22路车，下车急速拐到车尾后，心中忐忑。等过了马路，没听到售票员喊叫，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

蹇明理于1965年入学，未几被查出肝炎休学。文革中我班同学眼见人家纷纷扯帜聚义揪斗黑帮，我们无虎可打，只能打死老虎，也揪不出什么人。于是拿周泽兰老师开刀祭旗，写大字报愤怒声讨周泽兰迫害工农子弟的滔天罪行，在文史楼台阶上让周低头认罪，让她念大字报。后来蹇明理返校住小红楼——高干待遇。北师大九座小红楼，三十六位校领导和教授居住。这在全国高校应该是殊荣。文化革命他们被扫地出门。小红楼（现如今还在）被学生占领。

1968年，河南信阳淮河发水，我爱人隗仁莲家遭水淹（但那时候，她还绝对不是我爱人，她爱的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班同学捐赠50斤粮票，借了钱媛老师50元钱。我们做担保，保证毕业不会拍屁股一走了之。那时我们沐浴在幸福生活阳光中，50这个数额相当可观。结果我们守信。为何向钱媛老师借钱？因为她姓钱，她的父亲是钱钟书（千钟粟，种树的），大家都知道！可惜她的丈夫王德一因为5·16问题就跳楼自杀。和钱媛老师一样从英伦回来的严伯森老师（女）汉语不如英语好，有次她说，他们三个人“浩浩荡荡”走回来了（意思是有说有笑）。但她英语说得像快板。濮阳翔，我们管它叫濮阳，但他不是濮阳人。他被隔离审查，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和家里闹别扭，负气出走，好像是参

加了忠义救国军。也是一腔热血喷涌，以为自己是打日本。文革受隔离，大家以为他当年在沙家浜搜查过芦苇荡，智斗过阿庆嫂，在春来茶馆喝过茶，一定不是好人。其实他是负笈求学。他读“包括”，念作包 gua，括号，就是 gua 号。我觉得安徽古文化传统深厚。带舌的字，念刮：类如鸱，颀，铈，，龠，皆是。

1971年中共成立五十周年，工军宣队组织师生出板报纪念，诗文璀璨，各逞其才，以志贺忱。青年学子挥毫泼墨，争奇斗艳，不具一格，中文系师生才情尤佳。著名书法家启功大师为革命师生临池磨墨挥毫抄写，除大饱眼福外，我很想偷偷撕揭保存，可惜有贼心没贼胆，后来还懊悔多日。有一年为国庆赋诗，我写了“飞弧条条，银球点点”几个字摹状乒乓外交，被陈欣老师夸赞多次。

红海洋那阵子，我们搞语录袋，革命镜，一帮一，一对红，开展谈心活动，其实都是虚情假意。忘了我和谁结对对啦。送对方一条语录，比如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自惭形秽以为自己犯了骄傲自满的错误。迎接九大，除了一展歌喉（顾英俊、曹保健、林永福老师，佼佼者也），还用塑料海绵染成五颜六色，制作“挥手我前进”的工艺品。像章，领袖像章，越来越大。后来听说最高指示“还我飞机”，意思是铝材都做像章啦！红海洋时代，中文系段闻礼、隋玉梅在校园繁华地区交通要冲绘“挥手”“去安源”（我曾经想改名为安源）的巨幅画像。主楼八楼顶端中央是毛主席肖像，“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夜晚由荧光灯映衬照亮。后来到银川后我和段闻礼夫妇成莫逆。

文革后期闲得无聊，我曾和尔德晚上去师大绿园偷苹果。这是大学生活一页轶事。他后来当中学校长，我也为人师。后来看到少年郭沫若翻墙偷摘桃子，老师给出上联：“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郭沫若对曰：“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免受了皮肉之苦，于是觉着自己也算文化名人少年时代衔手指头。说这些过往轶事，无非表明，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切不可一谈过去，就光提当年勇，过五关斩六将。咱们都是毛孩儿。我们身上都有向善或作恶的因子，全看社会环境。大学时期我阅读过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著作，也读过严复严几道翻译的天演论，适者生存呀。■

【资料】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给毛的致敬电

1949年10月3日

敬爱的毛主席：

今天我们全国各界人民的代表，集合在首都北京，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大会一致决定向你致最热烈、最崇高的敬礼！因为正是你，领导着我们击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内反动派的统治，使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也正是你，领导着我们发挥创造性的劳动，建设起新民主主义，以大大加强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我们将永远紧紧跟着你，保持对国内外反动派的警惕，加强团结，与伟大的苏联一道，与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巩固人民民主，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不倦地斗争！在毛泽东的名字照耀下，我们永远胜利！■

1949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49年10月5日

亲爱的毛主席：

中苏友好协会今日在北京举行盛大的成立大会。我们到会的代表鉴于过去苏联对中国的伟大友谊和帮助，在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掩蔽和歪曲，中国人民与苏联的诚挚，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压制和摧残。正是由于你——我们的伟大领袖与革命导师，领导着我们扫除了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一切障碍，使我们能够坦率地表现出对苏联的诚挚友谊来。我们的大会一致决定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我们誓愿紧紧地追随着你，为增进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而努力，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文明幸福而努力，为争取世界人民民主与持久和平而努力！毛泽东的旗帜是保证我们胜利的旗帜！■

194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第二次代表大会给毛泽东同志的致敬电

1953年10月6日

我们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多少幸福啊，前天你偕同刘少奇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和其他党和政府的领袖们来和我们见了面。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被无上的欢乐所激荡。我们实在无法形容我们所受到的鼓励。

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明天，我们将回到各人的岗位，我们将更好地工作，来报答你和你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深切的关怀和期待。

在大会上，我们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他详细地向我们阐述了你所规定的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我们对祖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们充满了信心，增加了勇气，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在大会上，我们也检查了和讨论了这几年的工作，我们深刻地感到我们的工作离开祖国对我们的要求还很远。今后，我们将继续改造自己，更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深入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掌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真实地反映伟大时代的雄伟面貌，创造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

请接受我们对于你和你最亲密的战友们的衷心感激和最崇高的敬礼。■

《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读者来信】

1. 小庄谈“狼奶”

什么是狼奶？我的想法是：从出生开始的那个环境可能就是第一瓶“狼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被专制传统灌输了半辈子一辈子而产生的行为和语言，让孩子的心灵从一开始就受到污染。小学开始，更进一步接受系统化的专制思想教育，十几年下来，孩子的身心都充满了专制体系的毒素，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专制思想所规范。这种格式化的“狼奶”污染让大部分人完全丧失自由思想能力，一生一世只会按照专制思维应对生活中所面临的一切。进入社会后，专制体系下的行为准则再次让这个孩子体会到专制思维的现实意义。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他只能跟着现实走，一辈子被专制思维控制身心的一切，到死都不自知。我说的专制思维包含传统文化的皇权专制部分，也包含现代党文化的专制部分。眼下这两种因素有合二为一的倾向，古老专制传统被现代专制统治所需要，孩子们的狼奶还是要继续喝下去。

2. 国庆谈“狼奶”

见到“狼奶”征求读者发声，想起我十几年前写的一篇小文《不变资本概念的论证缺失》，大概谈到了“狼奶”的逻辑根源。所谓“吃狼奶”，顾名思义就是受到“丛林法则”的滋养。对“狼奶”的“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等解释似乎依然隔靴搔痒。具体到共产运动中的“狼奶”，便是“剥夺剥夺者”的理论。一旦“剥夺”成为正义，反右、文革等暴行便顺理成章。

3. 张晓良纠错

《记忆》126期，11页，正文倒数5行，机枪搜身，应为“机枪扫射”。
14页，倒数9行，“九大全体会议上”，应改为“九大”全体会议上。37页，
倒数7行，无锡辅仁中学，应为“无锡辅仁中学”。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